

# 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 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 一、前言

自從第一部《呂祖全書》於清代乾隆九年(1744)問世以後，乾隆、嘉慶兩朝的數十年間，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由各個呂祖扶乩道壇的弟子編纂和刊刻的四種《呂祖全書》<sup>1</sup>。這四種《呂祖全書》包括：(1)由劉體恕、黃誠恕等彙輯，乾隆九年刊刻完工的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附《禪宗正指》(全名為《佛說禪宗祕密修證了義集經》))，以下簡稱劉本；(2)由蔡來鶴及其弟子邵志琳(1748-1810)在乾隆四十年(1775)採集增添後完成的新編六十四卷《呂祖全書》(以下簡稱邵本)；(3)大約在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刊刻流傳後不久，即在乾隆末年，有蘇州呂祖信仰弟子批評邵本《呂祖全書》中呂祖道書的收集只以廣博為目標，卻未能考證所收錄的各種呂祖道書之真偽。因此，有汪柳亭、邱通宵、余馥林和陳聽濤等人，重新刊刻了另一部經過考訂之後的呂祖降鸞道書，即是所謂考訂本的《呂祖全書》，稱為《呂

---

<sup>1</sup>「扶乩」，亦稱「扶箕」或「扶鸞」，是道教信徒請示神明的宗教方法。「乩」從「占」從「乚」，乃是「箕」的俗寫。扶箕，最初是以箸插箕上，侍者扶著動的箕，使箸在沙盤上寫字，毋須筆墨。後來改箕為一丁字形木桿架在沙盤上，插筆於垂直一端，由兩手或兩人扶著架子，依法請神，木桿就於沙盤上書寫出文字，作為神明的指引或啓示，以顯吉凶。「扶鸞」或「飛鸞」就是扶箕，意指天上仙真駕鳳乘鸞，為求問者開化啓教。參焦大律(David Jordan)、歐大年(Daniel Overmyer)著，周育民譯：《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祖全書宗正》(以下簡稱《全書宗正》),共有十八卷。與劉、邵二本不同的是,《全書宗正》特別刪去一些屬於援儒入釋的禪宗經典(例如《禪宗正指》和《金剛經註釋》)、假託呂祖降鸞的《後八品經》,以及邵本增補的三卷《靈寶畢法》;(4)第四種《呂祖全書》初刊於嘉慶八年(1803),是由創壇於北京覺源壇的呂祖信仰弟子蔣予蒲(1756-1819)與同門弟子共同重訂舊本《全書宗正》的成果。覺源壇的掌壇宏教真人柳守元在其降鸞的〈全書正宗總序〉中稱:「惟是全書之刻,至次已經四見。」<sup>2</sup>蔣予蒲等一方面把《全書宗正》從劉本和邵本中刪去的呂祖鸞書重新增補入集,例如《禪宗正指》和《金剛經註解》;另一方面,蔣予蒲等又增添由呂祖降鸞註解的《道德經解》、《呂子易說》、《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寶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簡稱《靈妙真經疏解》)和《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簡稱《玉樞寶經疏解》)等呂祖道書,以及又補增呂祖降授覺源壇的訓語<sup>3</sup>。因自認為是接受呂祖降鸞的「正宗」之道壇,由覺源壇弟子重訂和刊刻的十六卷本《呂祖全書》,則稱為《呂祖全書正宗》(以下簡稱《全書正宗》)。

比較四種《呂祖全書》,可以說,最早的劉本是後來各種增輯重刊《呂祖全書》的底本,即是說邵本、《全書宗正》和《全書正宗》都是在劉本的基礎上彙纂、增補和刪改而刊刻成的。劉本於乾隆九年刊刻後,流傳很廣,對清代呂祖信仰的傳播發展影響甚大;從嘉慶、道光、同治而迄光緒等四朝,然後由民國時期直到當代,一直流傳著不同時期的重刊本,並廣泛刊行於各地的呂祖道壇<sup>4</sup>。

本論文以劉本為研究出發點,視之為清代《呂祖全書》的研究底本;一方面追溯在三十二卷本中所收錄的二十多部呂祖道書的源流、出處、形成及其與相關扶乩道壇的關係;另一方面,以劉本作為底本,進一步比較其餘三種《呂祖全書》,分析它們之間所採集和增補的呂祖道書的異同,整理出四種《呂祖

<sup>2</sup> [清]柳守元(託):〈呂祖全書正宗總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八年[1803]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卷首,序頁39b。

<sup>3</sup> 見[清]吳鳳洲(託):〈呂祖全書正宗凡例〉,同前註,卷首,凡例頁1a-5b。

<sup>4</sup> 自乾隆九年刊刻以後,涵三宮本《呂祖全書》於嘉慶庚申年(1800)、道光壬午年(1822)、道光庚戌年(1850)及同治戊辰年(1868)分別重刊過。此外,在香港有青松觀、圓玄學院、蓬瀛仙館和雲泉仙館等道觀,亦曾經於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九年、一九九〇年和二〇〇九年重刊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並續添第三十三卷《靈寶畢法》。

全書》各自的編纂特色、採集內容和刊行目的，以使我們能夠瞭解《呂祖全書》刊刻的歷史發展脈絡，且掌握清代呂祖乩壇弟子如何以刊刻呂祖全書為手段，推動傳播清代呂祖心性修煉和三教歸一的信仰思想之歷史發展和宗教意義。

關於清代呂祖扶乩信仰的研究，近來研究學者已經有很多著作成果，例如日本學者森由利亞 (Mori Yuria) 發表的多篇論文，已清楚地指出清代呂祖扶乩信仰的新發展和變化。清代呂祖扶乩信仰的推動者主要是以一批深受儒教科舉考試教育的士大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促進呂祖扶乩信仰獨立發展的主要力量。以康熙年間蘇州府長洲縣彭定求 (1645-1719) 家族為代表的玉壇<sup>5</sup>、康熙至乾隆年間湖北江夏諸生宋體誠、顧行恕、黃誠恕等的涵三宮<sup>6</sup>、嘉慶年間北京蔣予蒲的覺源壇等呂祖扶乩道壇為例，這些呂祖乩壇與清初全真教龍門派傳統都沒有直接的宗派傳承關係。因此，森由利亞不同意一些學者的結論，即是簡單地把清代全真教龍門派的傳統與呂祖扶乩信仰之間的關係，視為一種單質化的直線發展關係<sup>7</sup>。不過，另一方面，森由利亞亦以湖州金蓋山龍門派道士閔一得 (1758-1836) 及其所撰的《讀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管窺》為例，試圖證明清代龍門派傳統和呂祖扶乩信仰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交流、影響，甚至是結合。他說：「若是重視閔一得的視點的話，我們即便怎樣強調呂洞賓信仰的自立性，也都不能將其定位在全真教的外部。對於同一教的傳統來說，閔一得的全真教內含著共存的兩套探索方法，這樣看反倒會適合一些。」<sup>8</sup> 基於這種觀點，森由利亞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能否把扶乩勢力作為全真教外部存在

<sup>5</sup> 關於蘇州玉壇的資料，見《語錄大觀·玉詮語錄》，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 16 上，頁 90a-103b 及參〔清〕彭紹升：〈玉壇記〉，《一行居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年），頁 332-335。

<sup>6</sup> 見〔清〕黃誠恕：〈清微三品經序〉，收入〔清〕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卷 13，頁 3a-4b。如沒有特別註明，本論文所引用的劉本《呂祖全書》，皆以香港中文大學所藏道光三十年刊本為依據。

<sup>7</sup> 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 98 號（東京：日本道教學會，2001 年），頁 49；〈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と全真教——『清微宏範道門功課』の成立をめぐる——〉，收入堀池信夫、砂山稔編：《道教研究の最先端——第一九回國際宗教學宗教史會議世界大會道教パネル論集》（東京：大河書房，2006 年），頁 82-108。

<sup>8</sup> 森由利亞著，孫穎、葛強譯：〈呂洞賓與全真教——以清朝湖州金蓋山的事例為中心〉，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456。

的勢力，能否輕易地與全真教完全地剝離開？」<sup>9</sup>

然而，對於清代呂祖扶乩信仰與全真教龍門派傳統的關係問題的研究，本論文嘗試從清代四種《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刊行的發展經過，及其所採集各種呂祖降鸞道經的內涵，作出以下結論：清代呂祖道壇及其扶乩信仰的獨立和自主的發展結果，應該被視為自明末及清初以來道教歷史發展的新傳統。雖然這些呂祖扶乩道壇信徒提倡儒、釋、道三教同源和歸一的思想，但很清楚的，對他們來說，所謂一源之本乃是繫於其所信奉的先天無極大道<sup>10</sup>。因此，《清微三品經》稱：「知儒之道，與道與釋，同條共貫，無有二者。儒與釋教，總原於道。」並且，涵三宮的黃誠恕也清楚指出編纂和刊行呂祖降鸞道經的目的是為了「集《道藏》之大成」<sup>11</sup>、「總括諸《道藏》[精華]」<sup>12</sup>。依據此種集《道藏》大成及精華的宗旨，由蔣予蒲領導的覺源壇信徒就在編纂《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再於嘉慶年間，完成編纂并刊印了《道藏輯要》。據託名鍾離權降鸞的〈道藏輯要原序〉，稱：「覺源諸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棄偽而歸真，刪繁而就約。廣大精微，而天人之道備，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sup>13</sup>

以《呂祖全書》為代表的呂祖扶乩信仰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裏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中，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分子以非常投入的信仰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sup>14</sup>。這是

<sup>9</sup> 森由利亞：〈清代全真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收入《天台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17。

<sup>10</sup> 《涵三語錄》稱：「三教殊途，同歸太極，無所分別門戶也。」見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28，頁30b。

<sup>11</sup> 《清微三品經》，卷中，收入同前註，卷14，頁6a；黃誠恕：〈呂祖全書序〉，同上書，卷首，黃序頁3a。

<sup>12</sup> 《參同經》，卷下，同前註，卷18，頁32a。

<sup>13</sup> [清]彭文勤等纂輯，賀龍驤校勘：《重刊道藏輯要》（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重刊本，成都：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卷首，序頁8b。另參莫尼卡（Monica Esposito）撰，萬鈞譯：〈「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頁21-22。

<sup>14</sup> 莫尼卡指出：「不管是將《輯要》稱作『全真』道藏也好，還是將其編者稱作『全真教信徒』也好，都和《道藏輯要》的邏輯相左，也和其成員宣稱的身份相左。」見莫尼卡：〈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清代全真認同〉，收入趙衛東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頁319。

一場在道教史上從未有過的以呂祖扶乩信仰為核心而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假若研究者不承認清代呂祖扶乩信仰屬於道教的新傳統，具有獨特的歷史和宗教意義，這將造成我們未來研究清代道教史的困境。一方面將使我們對清代道教的新發展缺乏完整、準確和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亦造成我們缺乏適當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去理解現今在香港、臺灣和澳門等地的道教扶乩傳統及與其相關的呂祖道壇的歷史源頭及其延續的發展。

## 二、乾隆九年劉體恕等彙輯的《呂祖全書》

乾隆九年，劉體恕（本名樵，字柯臣，道號無我子）、黃誠恕（道號一行子）、劉允誠（號清虛）、劉蔭誠（號清惠）等合力彙輯了歷來第一部的《呂祖全書》。很清楚的，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與座落在湖北江夏縣城（今武漢市武昌區）的著名呂祖乩壇——涵三宮（又稱涵三壇或涵三道院）有直接的關係。（見地圖一）所謂「涵三」的意思，是指呂祖為三教之師，「綜儒、釋、道之全，而會歸於一」<sup>15</sup>。而黃誠恕是雍正和乾隆年間涵三宮乩壇的主要侍壇鸞生，也是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的主要彙輯者。黃誠恕在〈呂祖全書序〉中記敘了他與劉體恕決定彙纂《呂祖全書》的經過，稱：「余侍法席有年，有志彙纂而未逮。庚申(1740)冬，晤無我子劉君。一見歡然，相視莫逆。爰有同心，因敬叩師真，荷蒙許可，遂溯流而上，直抵清江（江西臨江府），邀集一二同志，博採遺文，廣搜聖訓，彙為全書三十二卷。」<sup>16</sup>

早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涵三宮的呂祖弟子已經開始叩請呂祖降鸞，闡演呂祖靈文經書。最早降鸞於涵三宮的經書是《清微三品經》。根據《清微三品經》呂祖的〈自序〉，呂祖始於「壬午歲(1702)，偶經夏汭，降於涵三壇，乃以予一家言，會合三教宗旨，闡演斯典」<sup>17</sup>。黃誠恕所撰的〈清微三品經序〉詳述了江夏縣儒生創立涵三宮乩壇的歷史經過。他說：

《清微三品》，呂祖所演也。江夏諸生顧行恕與同學宋體誠，並吳一恕、喬

<sup>15</sup> 黃誠恕：〈呂祖全書跋〉，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32，頁8b-9a。另《涵三語錄》稱：「是以予壇特命涵三之名，蓋會三歸一。又一道中包涵三教耳。」見同上書，卷28，頁38b。

<sup>16</sup> 黃誠恕撰：〈呂祖全書序〉，卷首，黃序頁3a-b。

<sup>17</sup> [清]呂祖（託）：〈清微三品經自序〉，同前註，卷13，頁2a。

以恕、恭恕等友善，相約請乩。敦延呂祖久矣。〔喬〕以恕善撫琴，一日操絃，曲將終而仙降。叩之，則呂祖也。觀其詩意飄然，脫屣塵垢，運筆如飛。試以事輒驗，羣相驚服。無何，遂有闡演《三品》之諭。即於宋氏〔即宋體誠〕樓頭開演，一時嚮道而至者，郡諸生魯思恕、於慎恕、耶律盡恕、國學楊傳恕，漢陽諸生傅敬恕，江邑諸生殷由恕、同恕與其弟為恕，先後羣集；復有魯循恕、王遵恕、馬慕恕、安依誠諸人左右之。尋因宋樓狹隘，復遷喬宅。然演典重務，雲輶尊嚴，住宅囂塵，慮有褻越。爰卜壇於城東北隅，得西陵陳太史大章舊宅。陳與殷故姻戚，聞其事，欣然樂施。即以原鏹為助，建資而皈依焉。一時會中，若安恒恕、李務恕、宋真恕、王醒恕、錢能恕、陳崇誠等，莫不爭先解捐，鳩工庀材，不一載而殿閣次第告成，所謂涵三宮是也。<sup>18</sup>

從上述引文可知，由湖北附近諸邑二十多位儒生合力創立的涵三宮呂祖乩壇，應是隨著康熙四十一年間呂祖開始降鸞敷演《清微三品經》而正式立壇。而以「涵三」為名，亦是於此時開始<sup>19</sup>。涵三宮弟子最初聚集於宋體誠的家宅樓頭，後因宋宅狹隘，遷至喬以恕家，但繼後又恐喬宅囂塵，會褻越呂祖的降鸞，因此再次另覓涵三宮新址於江夏縣城東北處的崇府山<sup>20</sup>。據說，這種出於地方儒生因為好慕呂祖降乩而結社創立乩壇，並叩請呂祖降鸞闡演道經的信仰風氣，在清初湖北武昌城頗為普遍。黃誠恕就曾說過：「余嘗謂呂祖道場，在鄂城者不少。」<sup>21</sup> 例如，比涵三宮立壇時間更早的一所呂祖乩壇是棲真觀的呂祖社。很多涵三宮的弟子在它創立之前，都曾參與過棲真觀的鸞生傅先生的侍鸞活動<sup>22</sup>。例如黃誠恕記有：「涵三方多有觀其〔傅先生〕道範者」、「吾友宋體誠嘗從先生遊」<sup>23</sup>。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收錄有由傅先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

<sup>18</sup> 黃誠恕：〈清微三品經序〉，同前註，卷13，序頁3a-b。

<sup>19</sup> 《涵三語錄》云：「繼復遷於宋氏樓頭，肇以涵三之名。」見同前註，卷28，頁27b。

<sup>20</sup> 根據《涵三語錄》，涵三宮弟子集於宋體誠的家宅樓頭之前，已在李務恕家宅樓頭開乩請鸞，云：「降〔李〕務恕樓示眾，云：予自三十年前，飛鸞演化。遂降神郭渚，畱駢此地，兆三品之良因，結萬緣之勝會，於斯樓基啓大業。」見同前註。

<sup>21</sup> 黃誠恕：〈叅同妙經序〉，同前註，卷16，序頁4a。

<sup>22</sup> 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收錄了兩部呂祖降鸞於棲真觀的道經，即：《九重闢關救演棲真大典拔濟苦海洞妙微仙經》（簡稱《五品仙經》）和《棲真宣演拔濟苦海雪過修真仙懺》（簡稱「修真仙懺」）。見同前註，卷12，頁1a-16b、卷23，頁1a-12a。

<sup>23</sup> 黃誠恕：〈傅先生傳〉，同前註，卷12，頁18a、19a。

接引呂祖飛鸞闡演的《五品仙經》。在《呂祖全書》所收錄的《五品仙經》裏，不僅有黃誠恕撰〈序〉，還附有另一篇〈傅先生傳〉。據〈傅先生傳〉：

棲真會傅先生者，江夏人也。淳樸質直，不事文飾；業岐黃，好道，雅慕呂祖。居武勝門外，與附近陳元芳、杜國相、劉九級等友善，結呂祖社，請乩。附郭東行半里許，有觀曰棲真，前對沙湖，後倚鳳凰山。水漲一碧千頃，退則緣隄柳陰中行，可以至觀。傅與諸同志常茲雅集。先是呂祖雲遊過楚，見會城東北隅，紫氣燭天，知有達人。康熙己未(1679)，祖遂尋紫光凝處而降乩焉。<sup>24</sup>

黃誠恕〈序〉亦提及當時在棲真觀呂祖社那些由儒入道的呂祖弟子的參與盛況，稱：「康熙己未歲，祖偶遊楚疆，見紫氣浮空，知有達人，因飛鸞而降。一時歸依法席者，多屬儒冠，稱盛會焉。」<sup>25</sup>

劉本《呂祖全書》所收錄的各卷道經，大約可區分為三大類別（見附表一）<sup>26</sup>。第一類是從卷一至卷五採集自宋明以來業已流傳的有關呂祖的仙蹟故事及其降鸞的詩詞文章。此外，還有卷二十九、卷三十的《修真傳道論》乃是輯自明《道藏》所收的《鍾呂傳道集》，而重新分作十八篇，上、下兩卷<sup>27</sup>。

值得一提的是，自南宋乾道二年(1166)開始，已有《純陽呂祖集》刊布於世。臺灣國家圖書館收藏有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河北省邯鄲縣重刊《純陽呂真人文集》八卷，並附載乾道二年由谷神子陳得一所撰的〈序〉<sup>28</sup>。根據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儒士楊良弼撰〈純陽呂祖集後序〉，記載：「有唐真人《純陽呂祖集》，共八卷。本傳及靈跡三卷，詩歌五卷。不知哀于何人，自宋乾道間已刊布於世。」<sup>29</sup>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卷五《文集》下收有楊良

<sup>24</sup> 同前註，卷12，頁17a。

<sup>25</sup> 黃誠恕：〈五品仙經序〉，同前註，卷12，序頁3a。

<sup>26</sup> 參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1期，頁16-21及李家駿：《〈呂祖全書〉研究：從劉體恕《呂祖全書》的編集和影響探討清代呂祖道壇的信仰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63、101。

<sup>27</sup> 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頁18；另見李家駿：《〈呂祖全書〉研究：從劉體恕《呂祖全書》的編集和影響探討清代呂祖道壇的信仰特色》，頁100。

<sup>28</sup> [唐]呂巖：《純陽呂真人文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頁數模糊。

<sup>29</sup> [明]楊良弼：〈純陽呂祖集後序〉，見呂岳：《純陽呂真人文集》，收入《道書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頁888b。另見楊良弼：〈呂祖全書文集後原序〉，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5，頁14a。

弼的〈呂祖全書文集後原序〉<sup>30</sup>，由此可知，劉體恕等在卷一至卷五所收集的《呂祖本傳》、《靈應事蹟》、《文集》（上、中、下），都是根據萬曆十一年楊良弼校刊的八卷本《純陽呂真人文集》改編、增刪而成<sup>31</sup>。

劉本《呂祖全書》所收錄的第二種呂祖道經是明末清初以來在不同呂祖乩壇所出的降鸞道書，因此，它們不屬於江夏涵三宮所出的鸞書。這些呂祖鸞書包括卷七、卷八的《忠誥》和《孝誥》，卷九、卷十的《〔前〕八品仙經》，卷十一的《後八品仙經》、卷十二的《五品仙經》、卷十九、二十的《聖德諸品經》和《金丹直指諸品經》及卷二十一的《醒心經》等。

首先，《忠誥》和《孝誥》原為六卷本的《忠孝寶誥》一書，是屬於呂祖降鸞之書。《呂祖全書》卷八收錄有一篇呂祖降鸞之跋文——〈忠孝總跋〉，記述呂祖於「今癸酉年十二月二四日批寫」。由於《呂祖全書》卷七另收有史大成(1621-1682)所撰的〈重刻忠孝誥序〉，而史大成又是明末清初時人，於順治十二年(1655)狀元及第<sup>32</sup>，因此，相信呂祖於癸酉年降鸞而完成《忠孝寶誥》的年份，應為明崇禎六年(1633)。〈忠孝總跋〉稱：呂祖「因遊回雁峯，得過花石城，雲端之上，香風縹緲。見周永祐、秦文超諸鯤、胡思恭等，虔誠拜請，因作《忠孝誥》六卷。」<sup>33</sup>據史大成〈重刻忠孝誥序〉，後來，又有姚方昇叩請呂祖刊行《忠孝寶誥》，此請並得「呂祖親降寶壇，用伸嘉勉。」<sup>34</sup>

其次有《八品仙經》，全名為《太上呂祖開天皇極證真闔洞妙仙經》，共上下兩卷。《八品仙經》共有呂祖道經八品，但是，各經原來分別出自於五處不同地域的呂祖乩壇，並且完成的時間也有差異。及至萬曆十七年(1589)至天啓六年(1626)間，有廣陵（揚州）萬店集仙樓的呂祖弟子啓佐子把這五部呂祖道經合刻起來，總稱為《八品仙經》。《呂祖全書》卷九收錄有李應陽於萬曆十七年所撰的〈合刻八品仙經原序〉，此序記敘了各品經的緣起經過：

《八品仙經》，蓋純陽呂祖師之纂著也。其一、二品授於廣陵，三、四品授於金陵（南京），五品授於毘陵（常州），六、七品授於信州（今江西上饒

<sup>30</sup> 楊良弼：〈呂祖全書文集後原序〉，卷5，頁14a-15a。

<sup>31</sup> 劉體恕彙輯的《呂祖全書》卷一〈傳聞正誤〉稱：「雲石楊良弼〈校刊呂祖文集後序〉，有靈蹟中濫收猥褻一二事，不雅馴，皆刪補。此舉有功呂祖不小。」（頁23a）

<sup>32</sup> 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頁17。

<sup>33</sup> 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8〈忠孝總跋〉，頁19a。

<sup>34</sup> [明]史大成：〈重刻忠孝誥序〉，同前註，卷7，序頁3b。

市)，八品授於臨江（今江西樟樹市臨江鎮）。仍諭授經眾信，存以俟取。至是乃命廣陵童啓佺子，普取梓布。李子序之。經至，啓佺彙錄，更祈仙姑何祖、紫陽張祖箕校，梓於萬店集仙樓。<sup>35</sup>

由於《呂祖全書》卷九還收錄了萬曆四十二年(1614)還陽道人趙性粹撰〈重刻八品仙經序〉和天啓六年呂祖降鸞的〈八品仙經自序〉。據此可知，合刻本《八品仙經》最早亦應要在明末天啓六年以後才完成合刻，刊行於世，廣為流傳。

乾隆九年本《呂祖全書》卷十一收錄了一卷頗具爭議性的呂祖道經，即為《呂祖孚佑演正警化宣說修仙證真還丹祕妙仙經》。據說，此經是湖北武昌城內呂祖乩壇玉皇閣的弟子徐太極於康熙十四年(1675)將此部「隱於臨江，祕而未傳」的經典，與「久刊於世」的《八品仙經》合刻起來的。徐太極改稱《八品仙經》為《前八品仙經》，而演於臨江的《呂祖孚佑演正警化宣說修仙證真還丹祕妙仙經》則稱為《後八品仙經》。徐太極並撰有〈刻後八品經原跋〉，稱：「不才弟子徐太極，至誠皈依，粗晰其義，奉行弗怠。忽一夕，夢黃冠博帶，有仙子之風焉。醒而有悟。隨起合刻前、後《八品仙經》，鑄之金石，公之天下。」<sup>36</sup>《後八品仙經》之具爭議性的原因乃是在於此經是否為假託呂祖之偽作。《後八品仙經》被收錄在劉本卷十一和邵本卷七之內，不過，值得注意的，劉體恕本人在其所撰的〈後八品經小序〉，已提及此經與一般呂祖降鸞道經不一樣，因為內有外丹和房中術之說，但他相信「呂祖龍沙顯跡，無非欲人煉精、氣、神三種藥物，以了脫生死，證果金仙，并無一語及外丹房術」<sup>37</sup>，因此，似乎原係不宜刊布此經。不過，劉體恕採取了一個折衷的看法，即是，既然相信係呂祖宣演之作，那麼世之修士就應該「勿徒執泥於語言文字，致生疑而起謗」<sup>38</sup>。然而，後來《全書宗正》和《全書正宗》的編輯者都刪去了《後八品仙經》，不收入在他們所輯的《呂祖全書》之內，結果便無必要有前、後《八品仙經》之分了。《全書宗正》編纂者在〈凡例〉中，更抨擊《後八品仙經》屬偽著：「《後八品經》，語多疑竇，並不言明譬喻，令人易入邪見，其為假托無疑。」<sup>39</sup>而《全書正宗》的〈凡例〉撰寫者——覺源守壇大惠真人弟子吳鳳

<sup>35</sup> [明] 李應陽：〈合刻八品仙經原序〉，同前註，卷9，序頁5a。

<sup>36</sup> [清] 徐太極：〈刻後八品經原跋〉，同前註，卷11，頁28b。

<sup>37</sup> 劉體恕：〈後八品經小序〉，同前註，卷11，序頁1a。

<sup>38</sup> 同前註，卷11，頁1b。

<sup>39</sup> [清] 陳謀補刻：〈呂祖全書宗正凡例〉，《呂祖全書宗正》，（清咸豐二年〔1852〕刻本，

洲——亦同意《全書宗正》的觀點，稱：「舊本《後八品》，洵如《宗正》所云：語多疑竇，確係假托。」<sup>40</sup>

劉本《呂祖全書》從其他呂祖乩壇所收錄的另一部著名的降鸞道書是上述已提及過的《五品仙經》。《五品仙經》全名為《九重闕關敕演棲真大典拔濟苦海洞妙佐微仙經》。此經源自於武昌城外棲真觀呂祖社弟子的請乩，是呂祖於康熙十八年飛鸞闡演此部經典。《五品仙經》收有呂祖降鸞親撰的〈五品仙經原序〉，解釋了《五品仙經》和《八品仙經》的關係。呂祖稱：「前在毘陵等處，勅演《八品》，窮理究源，除氛正氣，大道昭新，宗風洞達。今在鄂州，誨及弟子，拔眾苦惱。故演《五品》，以闡《八品》未闡之奧，說《八品》未說之祕。」<sup>41</sup>

第三類呂祖飛鸞道經，是一批直接由江夏縣涵三宮乩壇弟子在本壇開乩，叩請呂祖降授的道經，包括有：(1) 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四十三年(1704)之間演成的《清微三品經》(《呂祖全書》卷十三至卷十五)；(2) 從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間闡演的《禪宗正指》(附於乾隆九年全本全書之後)；(3) 從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四年(1739)，經歷前後七年才演成的《叅同經》(卷十六至卷十八)。除了此三部呂祖降授的道經之外，劉本《呂祖全書》還收錄有從康熙四十一年至乾隆四年，即前後三十七年間，由呂祖在涵三宮所降授之訓示和詩文，分別結集成為《涵三語錄》(卷二十八)和《涵三雜詠》(卷二十七)。劉體恕〈涵三雜詠小序〉記述了呂祖在涵三宮前後約四十載的演經經過，說：「《涵三雜詠》者，涵三宮在鄂城東隅，呂祖飛鸞開演處也。自康熙壬午(1702)演《三品經》，乾隆己未(1739)演《叅同經》，前後四十餘年。」<sup>42</sup>

如前所述，《清微三品經》是呂祖最先降鸞於涵三宮的經典，從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間演成此部經<sup>43</sup>。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微三品經》的鐫刻

京都：大谷大學藏)，卷1，凡例頁2a。

<sup>40</sup> 吳鳳洲(託)：〈呂祖全書正宗凡例〉，卷首，凡例頁1b。

<sup>41</sup> 呂祖(託)：〈五品仙經原序〉，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12，頁1a。

<sup>42</sup> 劉體恕：〈涵三雜詠小序〉，同前註，卷27，序頁1a。

<sup>43</sup> 《清微三品經》有上、中、下三卷。雖然經名冠上「清微」的稱號，但內容和淵源上與道教清微派沒有關係。劉體恕彙輯的《呂祖全書》卷十三收錄有〈呂祖晉秩佺元誥命〉，稱：純陽道士孚佑真人呂喆，宣教東南，演經之後，獲元始天尊頒錫晉階為「玉清真宰，道極無為，至佺至聖，萬炁持衡，孚佑現化，三教宗師，佺元廣法天尊」(序頁5a)。託名呂祖所撰的〈清微三品經自序〉稱此經為佺元廣法天尊(呂祖)在玉清聖境清微宮中與諸大天尊、無極神王、飛天大聖同詣元始天尊座下之後，獲得元始天尊批

工作始告完成，刊行於世。此年，涵三宮決定將「原鐫梵板」兩副，一送武當山，一貯涵三宮。但是，《清微三品經》並未能得到廣泛流傳。涵三宮的掌壇真人呂祖弟子柳榮對此亦有微言，他在降授的〈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說：「大典鐫印之後，我師即證無上玉清之果，而諸子亦被利，賴無窮之休。獨惜近念餘年，沿習漸微，廣佈未幾，甚有於斯典……。」<sup>44</sup>二十三年後，即雍正十三年（1735），有金陵弟子孫守恕，把《清微三品經》重梓，並改鐫為簡帙，裝訂成便函<sup>45</sup>。改鐫為便函的結果，相信是可以使《清微三品經》更廣泛流通。柳榮稱讚此種改易刊佈的新方式，稱：「特是道之精湛，雖已洩於探幽鉤隱之際。然而文之昭布，必有賴乎變綱調紀之人。佞教藩籬得斯誠信之子，可作東南半壁矣。」<sup>46</sup>涵三宮弟子孫守恕在重刊《清微三品經》時，亦同時纂輯了呂祖從康熙四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間，在涵三宮所降授之訓示，成為一帙的《涵三語錄》，並編為再刊的《清微三品經》的附錄<sup>47</sup>。《呂祖全書》卷二十八《涵三語錄》收有由涵三宮守壇顯化真人弟子王真人於雍正乙卯（1735）所撰的〈涵三語錄後記〉，王真人解釋了《清微三品經》與《涵三語錄》合刊印行的意義，說：「世之人以為，《語錄》可以為《三品》之緒餘；可即以為《三品》真經，亦無不可。」<sup>48</sup>乾隆九年，劉本《呂祖全書》的《涵三語錄》（卷二十八）的內容，除了包括雍正十三年孫守恕所纂輯的舊本《涵三語錄》之外（共五十八條），還增補了雍正十三年之後，呂祖在涵三宮所降授之訓示，共有二十九條。劉體恕〈涵三語錄小序〉補記了增補《涵三語錄》之事，稱：「紀述者黃君誠恕、吳君一恕、李君務恕；纂輯者孫君守恕、余姪允誠。續錄則余與黃君輯近年以來，黔中就楚，積經演典之訓，合前錄共為一卷。」<sup>49</sup>

涵三宮弟子於康熙四十三年請乩演成《清微三品經》之後，即約十年之後，又於康熙五十三年（1715）懇請呂祖同文帝請佛如來宣演禪宗秘要。乾隆九年的刊本（見圖一）在第三十二卷〈呂祖誥〉之後，附有一部《禪宗正指》，全

---

准而由佞元廣法天尊於康熙四十三年降鸞於涵三宮弟子闡演的靈章，故名為《清微三品經》。見《清微三品經》，卷上，同前註，卷13，頁4a-5a。

<sup>44</sup> 柳守元（託）：〈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同前註，卷15，頁20a。

<sup>45</sup> 黃誠恕：〈清微三品經序〉，同前註，卷13，序頁4a。

<sup>46</sup> 柳守元（託）：〈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卷15，頁20b-21a。

<sup>47</sup> [清]王真（託）：〈涵三語錄後記〉，同前註，卷28，頁48a。

<sup>48</sup> 同前註。

<sup>49</sup> 劉體恕：〈涵三語錄小序〉，同前註，卷28，序頁1a-b。

名為《佛說禪宗祕密修證了義集經》，共上、中、下三卷<sup>50</sup>。至於道光三十年(1850)的刊本(見圖二)則改將三卷本的《禪宗正指》，排印在全書第一冊的目錄和卷一之前<sup>51</sup>。劉本《呂祖全書》收錄有普陀山道人觀自在(即觀音菩薩)於康熙五十四年降鸞於「楚江城東道院涵三宮」的〈序〉文，記述了《禪宗正指》的緣起，說：「永命(即文昌帝君)、孚佑兩真人者，憫世禪宗流弊，發慈悲心，屢詣靈鸞，請佛宣演禪宗祕要。如來嘉我誠懇，特允其請。爰於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冬，特敕弟子阿難陀，降神於鄂之涵三宮孚佑真人道場，敷演如來禪宗密義。」<sup>52</sup>不過，實際而言，如來弟子阿難陀在涵三宮降鸞開演《禪宗正指》之事，應是與黃誠恕精通儒、釋、道三教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劉體恕在〈呂祖全書跋〉稱：「一行者，江夏諸生也。有道而文，深於禪學，兼通佺教。《楞嚴》、《金剛》諸經皆有註釋。」<sup>53</sup>因此可說，黃誠恕是《禪宗正指》的主要請乩演出者。清初依託呂祖降鸞宣揚佛法的禪宗著作還有其他例子，例如《金剛經註釋》、《金剛經注解》與《般若心經註解》等。雖然《禪宗正指》並沒有和上述三部呂祖降鸞的禪宗著作被收錄入《續藏經》<sup>54</sup>，但是此書在清代佛教居士群體之中，亦廣泛流傳。作為清初佛教居士的代表之一，蘇州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1740-1796)曾於乾隆間重刻和推廣《禪宗正指》。彭紹升並撰有〈書重刻禪宗祕密修證了義集經後〉，讚譽《禪宗正指》的貢獻在於指出禪宗流弊，確為呂祖闡演之作，他說：「此經指示正修，抉剔禪弊，多敲骨吸髓之談。非金口親宣，決難假託。」<sup>55</sup>

江夏涵三宮再次叩請呂祖闡演第三部經書——《叅同經》的背景原因，是

<sup>50</sup> 見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乾隆九年〔1744〕刊本，東京：東洋文庫藏)，卷1〈總目〉，頁2b。

<sup>51</sup> 見《禪宗正指》，卷上，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首，頁1a。據知，中國道教協會藏有道光二年(1822)《呂祖全書》(32卷)刊本。據此刊本，《禪宗正指》仍是外附於第三十二卷之後。但在《禪宗正指》之後，道光二年刊本另增補第三十三卷《純陽帝君說九轉證道妙經》及第三十四卷《關聖帝君正心化俗本願尊經》。

<sup>52</sup> [清] 普陀道人(託)：〈禪宗正指序〉，同前註，卷首，序頁1b。

<sup>53</sup> 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32，頁10b。

<sup>54</sup> [清] 溥仁乩釋，[清] 子真乩訂：《金剛經註釋》，收入《續藏經》(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1967年)，第40冊，頁19a-45a；[清] 孚佑帝君註解：《金剛經注解》，同上書，頁105a-121a；孚佑帝君註解，[清] 培真道人校正：《般若心經註解》，同上書，第42冊，頁76a-79c。

<sup>55</sup> 彭紹升：《一行居集》，卷2，頁3。

出於劉體恕、鄧優恕（即鄧東岩）、劉允誠（即劉清虛）、劉蔭誠（即劉清惠）、李立誠、鄧信誠等後來加入涵三宮的弟子的請求。黃誠恕〈叅同妙經序〉<sup>56</sup>、劉體恕〈叅同經小序〉及其〈呂祖全書跋〉<sup>57</sup>都分別記敘了劉體恕等諸生何時及如何開始接觸江夏縣涵三道場，以及後來演經和彙輯《呂祖全書》的由來和經過。

自從在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四年間，呂祖降鸞闡演《清微三品經》和《禪宗正指》之後，我們可相信江夏涵三宮已聞名於湖北及附近的呂祖乩壇。劉體恕、鄧優恕、劉允誠等儒生於雍正十一年(1733)初次相遇於貴州的。在此之前，由於貴陽儒生劉允誠因為曾隨父宦遊至湖北，並跟從涵三宮的創壇儒生宋體誠（即宋式南）學習，因此從宋師得悉涵三呂祖道場演有《清微三品經》和《禪宗正指》，因好慕呂祖，後更隨宋師至涵三宮拜謁呂祖，遂歸依該道場。劉允誠返回貴陽之後，與劉體恕等相識相遇，並向他們提及了江夏涵三宮「為呂祖飛鸞演經處前侍演者有一行黃誠恕在」，眾人於是皆喜，並「發積經演典之願」<sup>58</sup>。劉體恕等遂請劉允誠為先導，於雍正十二年(1734)帶李立誠、鄧信誠二人至江夏涵三宮拜謁呂祖，叩請在貴州建立分壇，開演經典。不久，開演首事者各散去，在貴州演經之事遂未能實現。但是，劉體恕和鄧優恕仍然堅持請乩演經之志，復請劉允誠從貴州遠赴涵三宮，完成演經之事，這即是劉體恕所稱的「就鄂完黔」。劉體恕〈呂祖全書跋〉記劉允誠「以宦裔寒糴，力任其勞，不憚奔走，往返水陸，經歷大湖，前後凡十數次。自始事以迄竣工者八年」<sup>59</sup>。經過前後六年(1734-1739)的努力積經，至乾隆四年(1739)冬，終告《叅同經》全部演成。《叅同經》，全名為《太上敕演救劫消災賜福解厄保運證真叅同妙經》，合二卷，共三十二章，為元廣法天尊（呂祖之晉號）心切度人，爰生悲憫，哀求元始天尊上帝開演之道經。據第一章〈法會緣起〉，說：呂祖「復蒙玉帝憫其慈願，敕允開演，遂與諸真列聖，降神鄂渚涵三道場。為諸天人，並在會弟子，宣說《太上救劫妙經》三十二章。」<sup>60</sup>

<sup>56</sup> 黃誠恕：〈叅同妙經序〉，卷 16，序頁 3a-4b。

<sup>57</sup> 劉體恕：〈叅同經小序〉，同前註，卷 16，序頁 1a-b；劉體恕：〈呂祖全書跋〉，同上書，卷 32，頁 10a-12a。

<sup>58</sup> 劉體恕：〈呂祖全書跋〉，卷 32，頁 10b。

<sup>59</sup> 同前註。

<sup>60</sup> 《叅同經》，卷上，同前註，卷 16，頁 3a。

乾隆四年完成開演《叅同經》之後，翌年(1740)冬，劉體恕因公務（時劉為貴州清平縣知縣）<sup>61</sup>赴京師，後經淮陽、金陵，然後至武昌，與黃誠恕、劉允誠會面。黃誠恕自述：「庚申(1740)冬，晤無我子劉君，一見歡然，相視莫逆。」可說這是他們的首次會面。由於黃誠恕稱「余侍法席有年，有志彙纂〔《呂祖全書》〕而未逮」<sup>62</sup>，因此，在這次見面時，黃誠恕提議彙纂《呂祖全書》，並得到劉體恕的積極支持，兩人遂有「彙刻《呂祖全書》之約」<sup>63</sup>。整個抄閱、商酌和纂輯的工作，主要是由黃誠恕承擔，當時他已年過七十了。從乾隆六年初春開始而至十月，黃誠恕便完成了彙輯三十二卷《呂祖全書》的底本工作。至於後續的讎校工作，則由劉允誠和劉蔭誠負責進行。最後，亦得到鄧優恕和丁存恕捐貲，共勦刊梓<sup>64</sup>。由於原書附有由貴州布政使陳德榮於乾隆九年孟秋所撰的序文<sup>65</sup>，因此，《呂祖全書》刊梓布行的時間不應早於乾隆九年之秋。

### 三、乾隆至嘉慶年間四種《呂祖全書》的比較

#### (一) 乾隆四十年邵志琳重輯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

據邵志琳（道號萬善子）說，乾隆九年劉本《呂祖全書》的原刊本係刊刻於義陵（即今湖南常德）的德馨堂<sup>66</sup>。劉體恕亦為義陵人。後來，在乾隆三十九年前，武林（今杭州市）憩園予以重刊<sup>67</sup>。據此，可知源於楚地的劉本《呂祖全書》已經在江南地區流傳，並對後來呂祖鸞書的編纂運動產生影響。

然而，就其決定在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1774-1775)增輯《呂祖全書》一事的緣起，邵志琳在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的〈增輯重梓序〉曾解釋過：「《全

<sup>61</sup> [清] 靖道謨等纂，[清] 張廣泗等修：《貴州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影印清乾隆六年[1741]刊本），卷18〈職官〉，頁364。

<sup>62</sup> 黃誠恕：〈呂祖全書序〉，卷首，黃序頁3a。

<sup>63</sup> 劉體恕：〈呂祖全書跋〉，卷32，頁11a。

<sup>64</sup> 劉體恕〈呂祖全書跋〉：「至（乾隆六年）十月，而底本成，凡三十二卷。其一切讎校，允誠實左右之，而蔭誠亦與焉。先是東岩（鄧優恕）在滇，聞纂輯全書之舉，甚喜。與丁存恕矢願捐貲，共勦刊梓。卒如其志。」同前註。

<sup>65</sup> [清] 陳德榮：〈呂祖全書序〉，同前註，卷首，陳序頁1a-7a。

<sup>66</sup> [清] 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收入龔鵬程、陳廖安編：《中華續道藏·初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第20冊，卷首〈姓氏〉，頁33a。

<sup>67</sup> 同前註，卷首〈姓氏〉，頁33b。

書》自義陵劉體恕彙輯後，迄今三十餘載，板雖存於西北，書未遍於東南。且時遠板訛，幾致湮沒。」<sup>68</sup>此外，蘇州彭啓豐（字翰文，號芝庭，1701-1784）撰〈重刻呂祖全書序〉亦說：「義陵劉氏彙祖師經訓刻爲一集，久之，其板漸廢。」<sup>69</sup>雖然，邵志琳和彭啓豐都提及劉本刻板因爲經過了三十年後已漸廢，但是，既然武林憩園在這段時間亦曾經重刊過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這樣，就不應該如邵志琳所說的「書未遍於東南」。反之，我們認爲蔡來鶴（道號靜一子）、邵志琳等決定廣採博搜，重加增輯《呂祖全書》的動機，是因爲他們認爲劉本《呂祖全書》未能達到全備無遺，以致能恰如書名所示，即可稱爲「全書」。黃誠恕在撰〈呂祖全書跋〉時，亦曾經爲「全書」的問題而作出申辯：「《呂祖全書》既成，客有問於一行子，曰：『子與無我子之彙輯《呂祖全書》也。果於呂祖之書全備無遺乎？』曰：『未也。』……〔客曰：〕『然則謂之全書，何也？』曰：『非謂其文字全也，蓋義全焉耳。』」<sup>70</sup>

雖然黃誠恕以「義全」之說來解釋「全書」之意，不過，縱觀乾隆九年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所收錄的二十多部呂祖降鸞道書的出處，除了輯自萬曆《純陽呂祖文集》和明朝《道藏》的《鍾呂傳道集》，以及收錄天啓年間廣陵集仙樓啓佺子合刻的《八品仙經》之外，其餘採集得來的大部分呂祖降鸞道經都是出於具有楚地（湖北）特色的呂祖乩壇。在〈叅同經小序〉裏，劉體恕更爲其所彙輯《呂祖全書》的楚地特色而感激呂祖對此地弟子的特別恩顧，他說：「〈五品經序〉有云：『呂祖垂憐三楚，百倍五陵。在祖慈腸度世，一視同仁，原無歧視。然《八品經》分演各處，獨楚地則一而再，再而三，如《五品》演於棲真，《三品》、《叅同》演於涵三。皆在鄂城內外。豈非桃源洞口，岳陽樓上，黃鵠機頭，靈蹟疊見，素稱仙人出沒之所。而龍沙八百，待時而應，迄今不遠歟。』」<sup>71</sup>但是，正因爲劉本《呂祖全書》所彙輯的呂祖扶鸞道書存在其地域性的特色和限制，因此，可以想見，江南地區的呂祖乩壇及其弟子自然會因劉本《呂祖全書》所收呂祖道書之未全而引發重新增輯的強烈動機和需求。

乾隆四十年，吳樹虛（1702-1781）〈〔重刻〕呂祖全書序〉說：「《呂祖全書》共三十二卷，則知據劉氏所搜之本全錄而無餘也。然名山之所藏，羽士之所

<sup>68</sup> 邵志琳：《〈呂祖全書〉增輯重梓序》，同前註，卷首，頁17a。

<sup>69</sup> [清]彭啓豐：〈重刻呂祖全書序〉，同前註，卷首，頁14a。

<sup>70</sup> 黃誠恕：〈呂祖全書跋〉，卷32，頁8a-b。

<sup>71</sup> 劉體恕：〈叅同經小序〉，卷16，序頁1a-b。

祕，蒐羅猶未能備，嗣後豈無感現之會，囑示之辭？雖全而未可云全，直以全收而全輯之云爾，非謂祖之教化，後世及此而此，而標以全也。」<sup>72</sup> 由於劉本「雖全而未可云全」，因此，遂有杭州呂祖扶乩信仰弟子蔡來鶴、邵志琳等再廣訪博求，以期呂祖鸞書更臻完備，並合劉氏原刊本，而另外增訂新本《呂祖全書》，共六十四卷。邵志琳在〈增輯重梓序〉中指出，當其六十四卷完成之後，此增訂本「自今而後，乃可稱全書矣」<sup>73</sup>。

基本上，乾隆四十年增訂的邵本《呂祖全書》，一方面是以劉氏德馨堂舊本三十二卷作為基礎，幾乎保留了全部劉氏舊本原來收錄的呂祖事蹟、文集及各種降鸞道經（見附表一）；另一方面，邵本又特別採集和增補了江浙地區各所呂祖乩壇所收藏的呂祖降鸞道經。邵志琳〈增輯重梓序〉指出，其增輯本與劉本相異的地方是：「將〔劉本〕字句舛訛者正之，卷帙參差者序之。於原本三十二卷外，復又採輯遺書，增訂為六十四卷。」<sup>74</sup> 另外，在其所撰〈凡例〉中，邵志琳亦重申其六十四卷本的基本內容結構：「是書劉氏德馨堂舊本三十二卷，外附《禪宗正(旨)(指)》一卷，不列全書之內。今增訂為六十四卷，裝潢二十八冊。其標註格式，一仍劉本，惟序次則小異。」<sup>75</sup> 概括而言，邵本對劉氏三十二卷本的序次，作了以下幾方面的改動：(1) 邵志琳把三十二卷本外附的《禪宗正指》正式收入全書之內，上、中、下三卷《禪宗正指》分別編成為第六十一、六十二和六十三卷；(2) 邵志琳在〈凡例〉中說：「《靈寶畢法》，劉本因其晚出，續於卷末。」<sup>76</sup> 邵本將三卷《靈寶畢法》編成第二十九、三十和三十一卷<sup>77</sup>；(3) 邵志琳將劉本原來的第十九卷《聖德諸品經》和第二十卷《金丹直指諸品經》合併為上、下兩卷本的《聖德諸品經》，即六十四卷本中的第十五和十六卷，並在《聖德諸品經》下卷補增《呂祖道德經》。

然而，除了保留原來劉本所收錄的各種呂祖道經之外，邵本增補的新道經，不單數量可觀，同時亦反映出清初以來，江南一帶地區呂祖信仰和乩壇的

<sup>72</sup> [清] 吳樹虛：〈〔重刻〕呂祖全書序〉，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首，頁 10b-11a。

<sup>73</sup> 邵志琳：〈呂祖全書增輯重梓序〉，同前註，卷首，頁 17b。

<sup>74</sup> 同前註。

<sup>75</sup> 邵志琳增輯：〈凡例〉，同前註，卷首，頁 19a。

<sup>76</sup> 同前註，卷首，頁 20a。

<sup>77</sup> 邵志琳在六十四卷《呂祖全書》的〈凡例〉中稱，劉本曾把三卷《靈寶畢法》附於《續編》。現存東洋文庫所藏的乾隆九年本《呂祖全書》沒發現有《續編》；而道光三十年本則在卷三十二後附有《續編》，即包括有《靈寶畢法》上、中、下三卷。

發展及其地方特色。換言之，我們可以從邵本所增補的呂祖降鸞道經，探討蘇州、浙江等江南地區呂祖乩壇的歷史概況。很顯然，邵本的江南道教呂祖乩壇的特色與其編纂者的地方背景有密切的淵源關係。蔡來鶴是增補和重鑄《呂祖全書》的發起者，他是杭州人，吳門儒生，後好慕養生之道，更於西湖南岸建立精舍，稱天香閣，敬奉文昌帝君和呂祖<sup>78</sup>。並且，在蔡來鶴、邵志琳、王雲軒等參與下，建立了乩壇，稱為「桂香集」。由於缺乏資料，未知天香閣精舍與桂香集的關係。但可確知，桂香集乩壇弟子有直接參與邵本《呂祖全書》的編纂計畫。邵志琳在〈增輯重梓序〉記稱：「〔琳〕慕祖師德教，不欲效世俗紈袴習，同里有叟執王君雲軒，好善樂施，不惜貲費，偕予桂香集友，重刻文帝全書。次年書成，王君又欲繼鑄祖師全書。」<sup>79</sup>此外，邵志琳亦記錄了重輯邵本《呂祖全書》的桂香集參與成員的名單：「武林桂香集重鑄本捐梓姓氏：王世陞雲軒；桂香集重鑄本增輯姓氏：邵志琳萬善；桂香集重鑄本謄錄姓氏：俞倫赤如；桂香集重鑄本監梓姓氏：蔡來鶴靜一。」<sup>80</sup>

邵本增補了乾隆九年劉本未備的呂祖道經有二十七種，共三十一卷（見附表二：「邵志琳六十四卷《呂祖全書》增補道經目錄」<sup>81</sup>）。我們可以追溯到降乩鸞壇出處的道書，計有十七種：

- (1) 卷十八：《廣慧修心保命超劫經》，邵志琳說：出於呂祖降鸞於虎林青平山（今浙江省奉化市），親授在壇弟子朱佳諫、鍾啓明、王中三人<sup>82</sup>。
- (2) 卷十九：《度人解厄延生證聖真經》，係康熙五年至六年（1666-1667）呂祖降授於杭州呂祖弟子沈清成<sup>83</sup>。
- (3) 卷二十二：《金丹示掌初編》，原係乾隆二十八年（1763）呂祖在湖州雲巢精舍降鸞之作。但據邵說，乾隆三十九年（1774）蔡來鶴至湖州時，呂祖又降授此經於湖州雲怡草堂，令其帶回杭州，交給邵志琳重輯<sup>84</sup>。
- (4) 卷二十五：《孚佑帝君訓世文》，係呂祖降示於越郡（今浙江紹興）陽明書院，

<sup>78</sup> [清] 趙金簡：〈呂祖全書重梓序〉，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首，頁 15a。

<sup>79</sup> 邵志琳：〈呂祖全書增輯重梓序〉，卷首，頁 17a。

<sup>80</sup> 同前註，卷首〈姓氏〉，頁 33b。

<sup>81</sup> 參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頁 19-20；另見李家駿：《《呂祖全書》研究：從劉體恕《呂祖全書》的編集和影響探討清代呂祖道壇的信仰特色》，頁 117-119。

<sup>82</sup> 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 18，頁 280a。

<sup>83</sup> 同前註，卷 19，頁 304a。

<sup>84</sup> 同前註，卷 22，頁 331a。

- 趙如鼎刊，並作跋。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有錢塘王純儒重鐫刊行<sup>85</sup>。
- (5) 卷二十六、卷二十七：《金剛經註釋》，邵志琳〈小序〉說：呂祖於順治十八年(1661)偕蓮池大師釋解《金剛經》，復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春降鸞於湖州雲巢精舍，刪正訂訛<sup>86</sup>。
- (6) 卷四十三：《名壇新詠》，係邵志琳彙輯江蘇、浙江等地呂祖乩壇降鸞的詩、文，包括有湖州雲巢精舍和雲怡草堂、蘇州彭氏玉壇等，另外有松江玉清壇和濟南趵突泉等<sup>87</sup>。
- (7) 卷四十四：《語錄會粹》，係邵志琳彙輯《雲巢精舍語錄》、《新月壇語錄》、《趵突泉語錄》、《玉清語錄》和《玉清壇語錄》等<sup>88</sup>。
- (8) 卷四十五：《福報指南》，附《正教編》，係邵志琳於乾隆四十年得自蘇州玉壇弟子彭紹升(1740-1796)<sup>89</sup>。
- (9) 卷四十六：《儒道同源》，係呂祖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在湖州雲巢精舍降鸞之作<sup>90</sup>。
- (10) 卷四十七：《群言會粹》，係呂祖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在湖州雲巢精舍降鸞之作<sup>91</sup>。
- (11) 卷四十九：《金華宗旨》，係呂祖先後於康熙七年至三十一年間(1668-1692)在江蘇昆陵(今常州)白龍精舍和古紅梅閣兩所乩壇降鸞所作。邵志琳所採集的不是康熙時的原本，僅為蘇州吳氏的抄本<sup>92</sup>。

<sup>85</sup> 同前註，卷25，頁386a。

<sup>86</sup> 同前註，卷16，頁407a。

<sup>87</sup> 同前註，卷43，頁692a。

<sup>88</sup> 同前註，卷44，頁733b。

<sup>89</sup> 同前註，卷45，頁772a。

<sup>90</sup> 同前註，卷46，頁792a。

<sup>91</sup> 同前註，卷47，頁800a。

<sup>92</sup> 同前註，卷49，頁818a。關於《金華宗旨》各種版本的流傳和比較研究，參 Monica Esposito (莫尼卡)，“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43 (1998): 90-110；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頁239-264；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5號(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1998年)，頁43-64。

- (12) 卷五十：《金丹種子篇》，採自湖州雲巢精舍刻本<sup>93</sup>。
- (13) 卷五十一：《警世功過格》，採自湖州雲巢精舍刻本<sup>94</sup>。
- (14) 卷五十二：《十戒十行垂訓》，係出自山東濟南趵突泉抄本<sup>95</sup>。
- (15) 卷五十七：《治病仙方決疑籤詩》，有呂祖降授方籤詩二百首，係邵志琳得自於嘉興（今上海市）北關古蓮庵內<sup>96</sup>。
- (16) 卷五十八：《金丹救劫度人寶懺》，係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石雲崖真人降筆於湖州雲巢精舍<sup>97</sup>。
- (17) 卷五十九：《玉清純陽慈航無極寶懺》，係康熙七年（1668）降授於守珍菴。邵志琳稱，係採自杭州元妙觀刻本<sup>98</sup>。

從上述所列出的邵本增補的呂祖道經的降鸞地區分布來看，主要有湖州、蘇州、杭州和常州（即毘陵）等江南地區的呂祖乩壇，而其中採集最多的是從湖州雲巢精舍求得的呂祖鸞書，包括有：《金丹示掌初編》、《金剛經註釋》、《名壇新咏》（部分）、《語錄會粹》（部分）、《儒道同源》、《群言會粹》、《金丹種子》、《警世功過格》及《金丹救劫度人寶懺》，共計九種道經，而大部分呂祖在雲巢精舍降鸞授經的時間則集中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的十年間。這亦反映出湖州雲巢精舍在乾隆時期已經成為活躍在浙江湖州地區的著名呂祖乩壇，更有稱其為「呂祖宗壇」。現在我們缺乏資料掌握嘉慶以前，特別是在閔一得（1758-1836）於嘉慶初入山，與同道桐鄉鮑廷博等重建純陽宮（舊稱古梅花古觀），並歸宗全真教龍門而開金蓋山支派之前<sup>99</sup>，湖州金蓋山雲巢精舍的活動狀況<sup>100</sup>。但可確信的是，乾隆時期，湖州金蓋山雲巢精舍是當地聞名的呂

<sup>93</sup> 邵志琳增輯：〈凡例〉，《呂祖全書》，卷首，頁 20b。

<sup>94</sup> 同前註。

<sup>95</sup> 同前註。

<sup>96</sup> 同前註，卷 57，頁 941a。

<sup>97</sup> 同前註，卷 58，頁 959a。

<sup>98</sup> 同前註，卷 59，頁 968a。

<sup>99</sup> 《金蓋心燈》、《龍門正宗流傳支流圖》及《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分別收錄於《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第三十一冊。關於湖州金蓋山龍門派傳統與閔一得的關係之研究，參吳亞魁：〈金蓋山人閔一得傳略〉，《宗教學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39-148；吳亞魁：《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80-296；莫尼卡（Monica Esposito）：〈清代全真教之重構：閔一得及其建立龍門正統的意願〉，二〇一〇 年一月六—八日香港青松觀「探古鑒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陳雲：《閔一得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

<sup>100</sup> 關於金蓋山古梅花觀在嘉慶以後發展的研究，參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撰，吳亞魁

祖降真之所，為浙江呂祖降鸞道經的著名道場。因此，當時金蓋山雲巢精舍的狀況應不致於如一些研究者所設想的，如：「乾隆甲午(1774)……未幾，毀於沙手（即鸞生），道場為之若失，鬼蜮技倆竟若此可畏哉！」<sup>101</sup>

## (二) 乾隆末十八卷本《呂祖全書宗正》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現藏有一部在咸豐二年(1852)刊刻的《呂祖全書宗正》，共十八卷(見圖三)。此刊本之卷一開首收錄了一篇由呂祖弟子陳謀所撰的〈修補全書記〉(見圖六)。據陳謀說：

《全書宗正》，長洲彭氏舊本也。乾隆十二年，吾鄉蓼圃周太史、祖父沙山太府君承陳觀察丁山長囑刻。以刪改未定，不及鏤板，遲數十年後，得汪丈柳亭、邱丈通宵、余丈馥林、先府君聽濤公，始悉力捐資刊刻行世，板存汪氏小築。<sup>102</sup>

陳謀說「《全書宗正》，長洲彭氏舊本也」一句意思未明，至少不能如莫尼卡所解讀的，即說舊本《全書宗正》或為長洲彭定求之子彭啓豐所衍生纂輯<sup>103</sup>。從康熙至乾隆年間，彭定求、彭啓豐和彭紹升等前後三代彭氏家族的扶鸞著作或是與彭氏家族有密切聯繫的玉壇所結集的鸞文——《玉詮語錄》，我們都不見有文字記載彭氏家族曾纂輯有《呂祖全書》的記錄。例如，彭啓豐於乾隆四十年為邵本《呂祖全書》所撰的〈重刻呂祖全書序〉，就只提及劉本和邵本的《呂祖全書》而已<sup>104</sup>。此外，在彭紹升的豐富著作中，如《一行居集》(八卷)和《二林居集》(二十四卷)都沒有提及蘇州玉壇有重輯《呂祖全書》的信息<sup>105</sup>。因此，我們只能認為陳謀說「《全書宗正》，長洲彭氏舊本也」一句的意思，是指在咸豐二年長洲彭氏家族藏有在乾隆末年由汪柳亭、邱通宵、余

---

譯：〈金蓋山網絡——近現代江南的全真居士組織〉，收入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頁319-339。

<sup>101</sup> 王宗耀編著：《湖州金蓋山古梅花觀志》(湖州：古梅花觀內部資料，2003年)，頁20。

<sup>102</sup> 陳謀：〈修補全書記〉，收入陳謀補刻：《呂祖全書宗正》，卷1，記頁1a。

<sup>103</sup> 見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頁246。

<sup>104</sup> 彭啓豐：〈重刻呂祖全書序〉，卷首，頁13a-14b。

<sup>105</sup> 關於蘇州呂祖乩壇——玉壇——的記載，彭紹升撰有〈玉壇記〉和〈玉壇耆舊傳〉二文。〈玉壇記〉、〈玉壇耆舊傳〉，《一行居集》，卷5，頁23-25、卷7，頁1-12。另參釋慧鐸：〈清初蘇州玉壇的降鸞應化——以《玉詮》為中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11期(2008年12月)，頁90-124。

丈馥和陳聽濤等刊刻的《全書宗正》的舊本，並且，相信在咸豐二年陳謀的補刻本是根據彭氏舊本來補輯原來已十有其四殘破的雕刻板。

至於在咸豐二年以前，提及《全書宗正》刊布流傳的文獻證據，可見於嘉慶八年由蔣予蒲等北京覺源壇弟子編纂的《全書正宗》；並且《全書正宗》的產生，正是要根據覺源壇的呂祖信仰來重訂舊本《全書宗正》。由覺源壇守壇真人吳鳳洲降書的〈全書正宗凡例〉說：「是集係就《宗正》本重訂」，「是集將《無極寶懺》列於卷首，《宗正》所未收入者迺係初本」，「文集《宗正》本祇寥寥數篇，今將《全書》內應入者補之」，以及「《禪宗正指》，《全書》內浙本、楚本皆收載已久，獨《宗正》以非專著不載。」<sup>106</sup> 若檢查咸豐二年本《全書宗正》，我們會發現此刊本對《禪宗正指》的確持著否定的立場，陳謀在〈凡例〉說明：「真本內刪去《禪宗正指》。」<sup>107</sup> 據此比對的例子，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乾隆四十年（即邵本刊行之年份）至嘉慶八年（《全書正宗》刊行之年份）之間，在劉本和邵本之外，還有另一部《呂祖全書》的輯本刊行流布，稱為《呂祖全書宗正》，並且又在咸豐二年再由陳謀補刻刊行。陳謀刻本還註明有「江寧顧晴崖刻字」，這亦引證《全書宗正》的產生和刊刻地區背景與蘇州有關連。陳謀在〈修補全書記〉記述了《全書宗正》在乾隆末刊刻的始末經過，說：

余五十年前（註：或即是嘉慶五年？）往來小築，屢親見之。嘉慶癸酉（1813）後，社友老者先後歸道山，壯者又公私交迫，無暇愛護。此板不知（于）〔下〕落。余尋求多年，於道光十年（1830）知堆貯西長街二帝祠。當即往查，已為濕爛虫傷，十損其四，只得將所存貳百餘塊，移至東藥局呂祖社內。隨淡吳子、補泉梁子邀余募補，而同人心既不屬，力亦不贍，因此中止。今忽忽又二十年矣。吳、梁均已下世，余不忍百年手澤一旦云亡。遂於咸豐壬子（1852）乘便，構板即行補刻，不硬撥公款，不勒勸分文，先為擔承，成後，與藏書板，公送孚佑帝君廟內，不出山門……。司事者，果盡心竭力，恪守成規，得補即補，則數年工夫，全換新板，允稱完璧。余拭目望之，且翹足企之，是為記。<sup>108</sup>

乾隆末《全書宗正》的編纂者重刻一部新本《呂祖全書》的最主要目的，

<sup>106</sup> 吳鳳洲（託）：〈呂祖全書正宗凡例〉，卷首，凡例頁 1a-b、2a、4a。

<sup>107</sup> 陳謀：〈呂祖全書宗正凡例〉，卷 1，凡例頁 5b-6a。

<sup>108</sup> 陳謀：〈修補全書記〉，卷 1，記頁 1a-2a。

是出於要重新修輯劉本和邵本。《全書宗正》的編纂者認為劉本和邵本的根本問題在於各自雖稱為「全書」，但由於此兩種刊本「惟意在全收」，因此就所收錄的道經就「不及考正」，以致在內容上產生許多真偽不分的問題，如「以訛傳訛者有之，詞多繁蕪者有之。字句遺漏鄙瑣不經者有之，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因為採集過濫，《全書宗正》編纂者評價劉本和邵本為「〔令〕覽者目眩神搖，茫無畔岸，貽悞玄修，莫可依據。」<sup>109</sup>基本上而言，《全書宗正》的編纂者是以一種「去偽存真」的考證方法和態度，意圖對劉本和邵本所謂「全收」的呂祖降鸞道經進行以下編輯工作：(1) 刪去偽託和附會的眾多經書，例如《後八品仙經》、《雪過修真仙懺》、《廣慧超劫經》等；(2) 將紛亂於各卷裏的近類道經重新整合起來；(3) 要將呂祖降授的三教合一訓示以直接、明快的方式表述出來。《全書宗正》收有一篇呂祖降授的〈孚佑帝君全書宗正自序〉，此序很直接地說出編纂者的編輯意圖：「當日涵三命名，原有三番終事之意。今日剝去皮膚，獨留真實。非其書全，其義全也。縱有增輯，無不能出此書之義蘊。」<sup>110</sup>

《全書宗正》十八卷，除了卷一所收錄的《呂祖寶誥》、《呂祖全傳》、《仙派源流》和《靈應事蹟》，以及卷十二和卷十三的呂祖文集和詩集之外，其餘十五卷共收錄了呂祖道經十三種。比對起來，《全書宗正》輯錄了劉本《呂祖全書》所收錄的主要呂祖道經，包括有：《忠誥》、《孝誥》、《〔前〕八品仙經》、《五品仙經》、《清微三品經》、《叅同經》（《全書宗正》改稱為《同叅經》）、《醒心經》、《涵三語錄》、《修真傳道集》、《敲爻歌沁園春註解》，合共有十種道經。但不收錄的劉本道經亦不少，有：《指佞篇》、《〔後〕八品仙經》、《聖德諸品經》、《金丹直指諸品經》、《度厄救劫救苦滌氛四神咒》、《雪過修真懺》、《玉樞經讚解》、《葫頭集》、《涵三雜詠》、《禪宗正指》，亦合共十種道經。（見附表三：「三十二卷《呂祖全書》與《呂祖全書宗正》比較」）至於《全書宗正》所收的但不在劉本《呂祖全書》之內的呂祖道經，則有《金華宗旨》、《金華闡幽》、《福報指南》、《正教編》、《儒道同源》、《群言會粹》、《警世功過格》、《百字碑註》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註》等九種道經。此外，若比較《全書宗正》和邵本《呂祖全書》，則很顯然，前者不僅不收入邵本後來新增補的很多道經，並且還批評邵本的弊病正在於對所收錄的道經欠缺嚴謹的考證工作，結果是道

<sup>109</sup> 陳謀：〈呂祖全書宗正凡例〉，卷1，凡例頁1a。

<sup>110</sup> 呂祖（託）：〈孚佑帝君全書宗正自序〉，收入陳謀補刻：《呂祖全書宗正》，卷1，自序頁2b-3a。

經真偽不分，致使「覽者目眩神搖，茫無畔岸，貽悞玄修，莫可依據。有志斯道者，繙閱維艱，從違鮮當，往往置書三嘆」<sup>111</sup>。

《全書宗正》編輯者對劉本和邵本所收錄的呂祖道經所作出的考證功夫，以及達至懷疑否定的結論，包括以下主要幾點：

(1) 劉本和邵本都收錄有《後八品仙經》一卷。但《全書宗正》編輯者卻否定《後八品仙經》為呂祖曾降授的真經。反之，他們認為：《後八品》，語多疑竇，並不言明譬喻，令人易入邪見，其為假托無疑。」<sup>112</sup>

(2) 《全書宗正》指出邵本的《廣慧修心保命超劫經》、《度人解厄延生證聖經》等增補呂祖道經，都屬「荒穢」之偽經，基於「去偽存真，以免泛濫」<sup>113</sup>的考證原則，《全書宗正》不收。

(3) 《全書宗正》不認同劉本把《禪宗正指》和邵本將《金剛經註釋》收入《呂祖全書》裏。就前者而言，《全書宗正》編輯者認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註釋》比較《禪宗正指》對三教合一之意的闡釋更為明快，因此，寧願選擇《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註釋》，而刪去《禪宗正指》。至於《金剛經註釋》，《全書宗正》編輯者則強烈批評此經乃屬假託清初禪宗雲棲蓮池大師的偽作，兼且「《金剛經註釋》援釋入儒，比擬不倫」<sup>114</sup>。

(4) 《全書宗正》編輯者不收錄呂祖懺經。劉本收有《雪過修真懺》，而邵本亦另再增補由湖州雲巢精舍所出的《金丹救劫度人寶懺》、《證道成真寶懺》，以及採自杭州玄妙觀刻本的《孚佑帝君無極寶懺》。但《全書宗正》編輯者卻對這些懺經的內容提出否定的觀點，說：「邵本續添《雪過懺》、《度人懺》、《成真懺》，不無附會。其《慈航無極寶懺》語次失倫，更多不經，真本未入。」<sup>115</sup>

(5) 劉本和邵本都收錄有《玉樞經讚》，但《全書宗正》編輯者卻認為「《玉樞寶經讚》附《玉樞或問》所輯並非呂祖之書」，因此，《全書宗正》不收載此經<sup>116</sup>。

(6) 雖然《全書宗正》與邵本都收錄《金華宗旨》，但二者對此道經的立場不相同。邵志琳是持著勉強保留的態度，一方面，他原本是不想收錄此經的，

<sup>111</sup> 陳謀：〈呂祖全書宗正凡例〉，卷1，凡例頁1a。

<sup>112</sup> 同前註，卷1，凡例頁2a。

<sup>113</sup> 同前註，卷1，凡例頁2b-3a。

<sup>114</sup> 同前註，卷1，凡例頁3a。

<sup>115</sup> 同前註，卷1，凡例頁5b。

<sup>116</sup> 同前註，卷1，凡例頁3b。

因為《金華宗旨》「所言養性回光法，涉於虛無浩渺，似難昭信，其款式近于行法家科儀。語句多荒謬，即有明順處，亦淺近無奇。」<sup>117</sup>但另一方面，卻由於《金華宗旨》已經成為「時俗所向」，因此之故，邵志琳勉強為此經稍加刪易，輯入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之內。然而，《全書宗正》編輯者卻持相反的立場，認為邵志琳之說未免有「褻視」此部呂祖道經之嫌，說：「《金華宗旨》，乃斗〔宮〕中教外別傳，祖師闡揚開演，未可褻視。」<sup>118</sup>

概括而言，面對乾隆年間先後刊行的兩部《呂祖全書》，《全書宗正》的纂輯者出於考證的基本態度，認為兩部《呂祖全書》所收錄的呂祖道經過於泛濫，以致真偽難分，因此以去偽存真的原則，輯錄了另一部《呂祖全書》的輯要本。這正如〈孚佑帝君全書宗正自序〉說：「今日剝去皮膚，獨留真實。非其書全，其義全也。縱有增輯，無不能出此書之義蘊。」因此，《全書宗正》的纂輯目的是要清楚和準確地保留和宣揚呂祖信仰的義蘊。十八卷本《全書宗正》共收入十九種呂祖降鸞道經，主要的內容出處包括：(1) 收錄了劉本《呂祖全書》中的十種呂祖道經，包括：《忠誥》、《孝誥》、《〔前〕八品仙經》、《五品仙經》、《清微三品經》、《叅同經》、《醒心經》、《涵三語錄》、《修真傳道集》和《敲爻歌沁園註解》；(2) 收錄了邵本《呂祖全書》所收錄的八種呂祖道經，即包括有：《金華宗旨》、《金華闡幽》、《福報指南》、《正教編》、《儒道同源》、《群言會粹》、《警世功過格》和《百字碑註解》；(3) 此外新增補另一部道經，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註釋》。

### (三) 嘉慶十年十六卷本《呂祖全書正宗》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另藏有一部嘉慶十年刻本的十六卷《呂祖全書正宗》(見圖四)<sup>119</sup>。此藏本卷首收載有九篇序言<sup>120</sup>：(1) 朱珪(字石君，1732-1806)撰

<sup>117</sup> 邵志琳：《呂祖全書·凡例》，卷首，頁20b。

<sup>118</sup> 陳謀：《呂祖全書宗正凡例》，卷1，凡例頁4a。

<sup>119</sup> 根據森由利亞，在日本京都大谷大學收藏的《全書正宗》是屬嘉慶十年的刊本，因為例如在卷十二的《金丹心法》裏，有徐震後跋，記云：「現屆同人重來訂《全書正宗》，因此表明《全書正宗》曾經在嘉慶八年之後被重新修訂。此外在《全書正宗》卷一《十六品經》裏，載有吳璫於嘉慶乙丑(1805)所撰的〈十六品經後跋〉。因此，森由利亞認為：「這裏所用的《全書正宗》，最早於嘉慶八年刊行，其後在嘉慶十年被重新修訂。」見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子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36-37。

<sup>120</sup> 蔣子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1a-40b。

於嘉慶八年二月的〈全書正宗後序〉；(2) 戴衢亨 (1755-1811) 撰於嘉慶八年孟春月的〈全書正宗後序〉；(3) 孚佑帝君和觀音大士降鸞的〈全書正宗成後弁言〉；(4) 觀音大士（自稱紫竹林中老衲）降書〈全書正宗總序〉；(5) 巨光降筆〈全書正宗總序〉；(6) 東華道人（即東華帝君王玄甫）降書〈全書正宗總序〉；(7) 文昌帝君降書〈全書正宗總序〉；(8) 呂祖降書〈全書正宗自序〉；及 (9) 覺源壇掌壇宏教真君柳守元撰〈全書正宗總序〉。

朱珪〈全書正宗後序〉稱：「蔣太僕予蒲示予彙刻《呂祖全書》十六卷，且請識數言于後。」<sup>121</sup>（見圖五）戴衢亨〈全書正宗後序〉亦說：「太僕卿蔣爰亭七兄，具善知識，勇猛精進，得未曾有。昨歲嘉平月，以《全書正宗》見示，並屬爲序。」<sup>122</sup> 據朱珪和戴衢亨兩序，可知蔣予蒲（字元庭，1756-1819）是於嘉慶七年（1802）完成彙輯十六卷本《呂祖全書正宗》，並應不遲於翌年即嘉慶八年，將此第四種《呂祖全書》刊刻完成，布行於世。根據李桓輯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四記國史館本傳「蔣予蒲」條，蔣予蒲是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進士，並獲翰林院庶吉士頭銜。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被任命爲《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而於嘉慶六年（1801）蔣予蒲被任命爲太僕寺卿，故朱珪和戴衢亨兩序皆稱蔣予蒲爲「蔣太僕」<sup>123</sup>。

與乾隆九年劉本《呂祖全書》出於江夏涵三宮的模式相近似<sup>124</sup>，《全書正宗》的編纂和刊行亦是由一群在北京城熱衷呂祖扶鸞信仰的高官文人合力編輯而成的。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說：「吾有鸞化之地，必無不傳之文。茲覺源本壇，輯前此分傳疊誌之遺文，重加遴選增益。起於本歲首夏，竣於孟冬。雖百餘日，而吾弟子柳守元等董理護持，俾功成全備。……夫成斯集者，奉教弟子惠覺、法嗣恩洪、大固、志秋、通仁、德明、大器、志喜、志卓，均照例備，附載於篇。此爲序。」<sup>125</sup> 這裏所提到的「覺源本壇」（又稱大覺法壇、第一覺壇及第一開化壇）就是蔣予蒲（法名惠覺）及其他呂祖信仰扶鸞的同門弟子共同在北京創立的乩壇的名字。關於「覺源」一詞，據《全書正宗》可知約

<sup>121</sup> [清] 朱珪：〈呂祖全書正宗後序〉，同前註，卷首，序頁 1a。

<sup>122</sup> [清] 戴衢亨：〈呂祖全書正宗後序〉，同前註，卷首，序頁 6a。

<sup>123</sup> [清]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94，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第 146 冊，頁 160-163。

<sup>124</sup> 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撰，萬鈞譯：〈「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說：「涵三宮成爲了蔣予蒲扶鸞壇的樣板。」（頁 21）

<sup>125</sup> 蔣予蒲：〈呂祖全書正宗自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 33b-35b。

有兩個意思。其一，覺源壇弟子恩悟所撰的〈全書正宗後跋〉稱：「孚佑帝師之慈悲濟度也，讚莫能窮矣。飛鸞行化，誓願度人。凡數千百年，壇地遍寰區。壇地以七覺爲最著，京師首善之地。覺源洪開斯土，大啓後人。」<sup>126</sup>這是從京師的地理位置來說，由於此乩壇創立在京師之地，因此具有覺世之源，大啓後人的用意。其二，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則解釋說：「滴滴歸源，乃爲正覺。」<sup>127</sup>這是從覺源壇的正統性來說，即是說覺源壇是千百餘載以來，呂祖降鸞的正宗之壇。所以呂祖的鸞序說：「是爲千百餘載，千百餘壇，歷來所傳之眞印，今乃可名以正宗。」<sup>128</sup>此外，關於覺源壇創立的具體歷史，《全書正宗》提供的信息不算多，目前我們還沒法具體掌握這所建立在京城內的呂祖乩壇的存在狀況。其中可知的歷史信息，是由恩悟所撰的〈全書正宗後跋〉：「歲屬戊午(1798)之冬，大壇重啓，其奉恩命，如宏教眞君，爲斯壇掌教宣秘，慈悲上接帝師。」<sup>129</sup>據此，覺源壇於嘉慶三年之前已經創立了。在《全書正宗》裏，覺源壇的呂祖信仰弟子經常自稱爲「天仙嗣派弟子」；並且強調他們所學的金丹修煉是屬於「天仙之道」。例如蔣予蒲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自署稱爲「天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謹誌」，說：「謹按此經，乃性命兼修，天仙之的傳也。」<sup>130</sup>覺源壇弟子相信此天仙嗣派的乩壇爲呂祖降經的特別場所，因此，例如范鏊（法名志秋）稱：「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祖也」；並且呂祖爲天仙派傳有二十字的派詩，志秋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說：

因思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必有留傳字句。詢之惠覺，蒙敬述云：昔聞有二十字曰：寂然無一物，妙合於先天，元陽復本位，獨步玉京仙。<sup>131</sup>

雖然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說，《全書正宗》的編纂工作大約是從嘉慶七年的夏天開始（「起於本歲首夏」），經歷了一百餘日，完成於同年冬季（「竣於孟冬」），但是，根據《全書正宗》所收錄的呂祖降鸞道經的其他信息，

<sup>126</sup> [清] 恩悟：〈呂祖全書正宗後跋〉，同前註，卷首，序頁 62a。

<sup>127</sup> 蔣予蒲：〈呂祖全書正宗自序〉，卷首，序頁 35a。

<sup>128</sup> 同前註，卷首，序頁 34a-b。

<sup>129</sup> 恩悟：〈呂祖全書正宗後跋〉，卷首，序頁 62a-b。

<sup>130</sup> 蔣予蒲：〈天仙金華宗旨後跋〉，同前註，卷 2，頁 22a。

<sup>131</sup> [清]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同前註，卷 2，頁 67b。關於覺源壇的天仙派傳統，參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 41；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頁 248-249。

蔣予蒲至少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已開始以《呂祖全書宗正》為底本，進行編輯訂校《十六品經》，並直至嘉慶五年，始完成定本。蔣予蒲撰〈十六品經後跋〉說：「小子蒲自甲寅(1794)以來，陸續得觀各品，編輯訂校，已幾七年。迄庚申(1800)歲，始有定本，視《宗正》舊刊較詳。今同學方旭、方曉覆校而重刊之。首將是刻收入集中。」<sup>132</sup>此外，在《全書正宗》卷十二收錄的《金丹心法》裏，附錄有蔣予蒲撰〈金丹心法後跋〉：「嘉慶二年六月十八日，予晤持眞子於濟南，得觀《金丹心法》一書。悚然起立，而嘆曰：『妙哉，道也。』」<sup>133</sup>根據上述所引兩篇序可知，蔣予蒲及其他覺源壇弟子編纂《全書正宗》的時間，應早於乾隆五十九年便開始進行，經歷九年時間，最後於嘉慶八年上元日完成刻刊十六卷本的《全書正宗》。

嘉慶十年十六卷《呂祖全書正宗》之〈凡例〉，據說是由覺源壇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授的。〈凡例〉開首，即清楚說明了《全書正宗》與過去三種《呂祖全書》的關係：「是集係就《宗正》原本重訂。恭檢全書，劉體恕所刻三十二卷、邵志琳所刻六十四卷，及各道典，並志集、石刻，一一查校、採補、增添，慎之又慎，不敢誇多鬥靡，漫行列入。」<sup>134</sup>就之與其前三種《呂祖全書》的關係，《全書正宗》明顯是修輯之前的《全書宗正》而成為新一種的重訂本。不過，雖稱為「係就《宗正》原本重訂」，但是實際上，《全書正宗》不單與《全書宗正》所收錄的呂祖道經有部分不同（見附表四：「《全書正宗》與《全書宗正》所收道經比對」），彼此對降鸞道經的觀點又有差異；並且，覺源壇弟子編纂《全書正宗》的最終目的又是建立在其嗣派天仙派的身分意識和傳教志向之上，因此之故，我們不應簡單地將《全書正宗》視為《全書宗正》的重訂本而已。

《全書正宗》首先收錄了《〔前〕八品仙經》、《五品仙經》和《清微三品仙經》，但把此三部經合刊為《十六品經》(卷一)。此外，還收有《金華宗旨》(卷二)、《同參經》(卷三)、《呂帝文集》(卷五)、《呂帝詩集》(卷六)、《修真傳道集》(卷十一)、《功過格》(卷十四)、《呂祖事蹟》(卷十五)及《語錄》(卷十六)等。以上《全書正宗》所收錄的呂祖道經大約與《全書宗正》相同。而

<sup>132</sup> 蔣予蒲：〈十六品經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7b。

<sup>133</sup> 蔣予蒲：〈金丹心法後跋〉，同前註，卷12，頁126a。

<sup>134</sup> 吳鳳洲（託）：〈呂祖全書正宗凡例〉，卷首，凡例頁1a。

就刪去《〔後〕八品經》的立場，二者持相同觀點，《全書正宗》說：「舊本《後八品》，洵如《宗正》所云，語多疑竇，確係假托。」<sup>135</sup> 另外，《全書正宗》編纂者亦贊成《全書宗正》對《金華宗旨》的重視，同樣不支持邵志琳之褻視此經為「似非正大」<sup>136</sup>。不過，比較而言，覺源壇的《全書正宗》更重視《金華宗旨》，把它作為天仙派正統的經典，以致將邵本原名之《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改動為《天仙金華宗旨》，用意是要將《金華宗旨》從其原來與淨明道派的歷史關係中分割出來<sup>137</sup>。〈全書正宗凡例〉即表明：「《金華宗旨》係教外別傳，天仙的派。非僅淨明之道，如《宗教錄》等書也。學者非伐毛洗髓，深得金丹三昧者，未必能知此書之妙也。」<sup>138</sup>

然而，與《全書宗正》所持的對《禪宗正指》、《金剛經註釋》、《玉樞寶經》、《孚佑帝君慈航無極寶懺》等道經的否定和不收錄立場相反，《全書正宗》的編纂者卻接受這些道經並收錄入其《全書》之內，所持理由引述如下：

(1) 《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卷首〈凡例〉說，《全書正宗》將《無極寶懺》列於卷首，至於《宗正》所未收入的《無極寶懺》乃係初本，《全書正宗》所收錄之本已是經過重加改訂的<sup>139</sup>。

(2) 《金剛經註釋》，卷七：原來《全書宗正》以為《金剛經註釋》「以拉入蓮池大師為憾，並援釋入儒」，因此不收入《全書》之內。但是，《全書正宗》編纂者卻持相反意見，認為：「《金剛經》先後三注，妙傳般若，直指大乘，所與蓮池大師互相問答發明，更足仰窺濟世婆心。」<sup>140</sup>

<sup>135</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1b。

<sup>136</sup> [清] 通宵：〈天仙太乙金華宗旨後跋〉稱：「所惜者，萬善子既已補入《全書》，又云出言似非正大，字句涉於舛錯者，悉皆刪易之。審此恐非全璧。」（同前註，卷 2，頁 64b）

<sup>137</sup> 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太乙金華宗旨》的最早版本，是乾隆四十年邵志琳在六十四卷本裏所收錄的整理本。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華宗旨》中，潘易庵、劉度庵、許深庵、顧旦初（又名顧日融）、莊惺庵、屠宇庵、張爽庵等七位傳此經者所作的序文中，都署稱自己為「淨明嗣派後學弟子」。見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 49，頁 827a。關於《太乙金華宗旨》的緣起及其與淨明道派的關係，參 Mori Yuria,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u in Qing China," in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ed.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165-170；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頁 43-64。

<sup>138</sup> 吳鳳洲（託）：〈呂祖全書正宗凡例〉，卷首，凡例頁 2a。

<sup>139</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1b。

<sup>140</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2b。

(3)《禪宗正指》，卷十三：《全書正宗》將《禪宗正指》上、中、下三卷合為一卷。〈凡例〉解釋說：「《禪宗正旨》，《全書》內浙本、楚本皆收載已久。獨《宗正》以非專著不載。抑思《金剛》、《道德》，皆係注釋古經。但闡至功何分畛域？況涵三道院特請勅演，自係刻不可少之經。」<sup>141</sup>

除了補增《無極寶懺》、《金剛經註釋》和《禪宗正指》之外，《全書正宗》還新增了《道德經解》、《斗經疏解》、《雷經疏解》、《呂子易說》、《天仙金丹心法》和《玄宗正旨》等六種新補道經。這些新收載的道經都被說成是呂祖降授的天仙正派的經典。例如關於《玄宗正旨》，〈凡例〉說：「《玄宗正旨》，為天仙妙道真傳，闡宣微奧，發萬古丹經，未洩之蘊。」<sup>142</sup>對於《道德經解》和《斗經疏解》，〈凡例〉稱：「《道德經〔解〕》為金丹之祖，天仙之宗」；「《斗經〔疏解〕》為特頒巨典，天仙正宗。」<sup>143</sup>

#### 四、結語：一群在家呂祖信徒的宗教經書編纂運動

按照元代已經確立的全真教的教祖道統，呂洞賓是全真教五祖的第三人，先由太上老君開始傳授與全真教之始祖東華教主少陽帝君王玄甫，東華帝君傳正陽帝君鍾離權，正陽帝君傳孚佑帝君呂純陽，孚佑帝君傳海蟾帝君劉操，海蟾帝君傳重陽帝君王重陽<sup>144</sup>。例如元朝苗善時撰《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把呂純陽塑造為繼承全真教道統的仙人：「〔呂純陽帝君〕繼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聖師，神化無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sup>145</sup>

然而，清初以來由呂祖扶鸞信仰弟子推動的《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刊刻運動，究竟同全真教呂純陽祖師的道統傳統有無關係？或者說，這些清代呂祖乩壇是否可稱為隸屬於全真教呢？具體而言，尊奉呂祖為扶鸞始祖的蘇州玉壇、江夏涵三宮、湖州雲怡草堂和雲巢精舍、北京覺源壇等呂祖信仰弟子能否被稱

<sup>141</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4a。

<sup>142</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3b。

<sup>143</sup> 同前註，卷首，凡例頁 3a。

<sup>144</sup> 參〔元〕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制詞》，收入《道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冊，頁704。

<sup>145</sup> 同前註，頁705。另參森由利亞：〈『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に見る全真教の特徴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9號（1992年），頁31-47。

作「全真教信徒」<sup>146</sup>？

綜觀本論文對清代四種《呂祖全書》的比較研究，四種《呂祖全書》的主要編纂者皆與全真教傳統或其道觀沒有關係。劉體恕〈呂祖全書跋〉自稱在其好慕涵三宮呂祖飛鸞信仰之前，「予總角入鄉校，從梅中軒師，講伊洛之學。……知鄂渚涵三宮爲呂祖飛鸞演經處……，聞而慕之」<sup>147</sup>。黃誠恕是涵三宮的主要侍鸞者，他是「江夏諸生也。有道而文，深於禪學，兼通佉教、《楞嚴》、《金剛》諸經，皆有註釋」<sup>148</sup>。蔡來鶴出身於吳門儒家，其名與全真龍門派詩無關，只應蔡母夢鶴來而生，因以命名。據趙金蘭撰〈呂祖全書重梓序〉，蔡來鶴：「少讀經史，長而慕養生之道，遂盡棄人生繫戀之欲，攜筠籃走四方，以惜字紙爲業，近寓湖南淨慈之旁天香閣，敬奉文昌神。」<sup>149</sup>邵志琳親撰〈增輯重梓序〉時，自述：「琳總角時，志好清靜，不愛嬉遊，自課讀外，每日必誦《文帝救劫章》一遍。既冠後，慕祖師德教，不欲效世俗紈袴習。」<sup>150</sup>蔣予蒲的覺源壇以天仙派正宗自詡，超越全真教南宗、北宗，而直接由呂祖賜派名天仙，並以呂祖扶鸞乩壇的形式傳布正宗的天仙大道。

清代四種《呂祖全書》收載了超過六十部呂祖降鸞的道經。據本論文統計，涉及各地的呂祖乩壇，包括廣陵萬店的集仙樓、湖北武昌的玉皇閣、棲真觀和涵三宮、蘇州彭氏玉壇、湖州的雲巢精舍和雲怡草堂、松江玉清壇、濟南趵突泉、北京覺源壇等。上述各地的呂祖扶鸞乩壇都在全真教傳統之外存在並建立其呂祖信仰的宗教信徒社團。正如我們在本論文開始所說：很清楚的，以《呂祖全書》爲代表的呂祖扶乩信仰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裏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發生在各地的呂祖乩壇，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分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爲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

<sup>146</sup> 莫尼卡在〈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清代全真認同〉一文，已經提出以下的問題：「尊呂洞賓爲始祖的蔣元庭及其扶鸞壇同伴能否被稱作『全真教信徒』？」（見頁319）

<sup>147</sup> 劉體恕：〈呂祖全書跋〉，卷32，頁10a-b。

<sup>148</sup> 同前註，卷32，頁10b。

<sup>149</sup> 趙金蘭：〈呂祖全書重梓序〉，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首，頁15a。

<sup>150</sup> 邵志琳：《呂祖全書》增輯重梓序，頁17a。

本論文旨在通過比對清代四種《呂祖全書》的內容差異和增減，呈現清代呂祖扶乩道壇如何藉著編纂和刊刻《呂祖全書》來推動呂祖信仰的發展及其中的宗教意義。從以上四種《呂祖全書》內容的差異出發，進一步探討不同區域呂祖信仰的特色及其分別，以及整理出清代呂祖扶乩道壇降乩的歷史發展經過，將是筆者未來研究的重點。

附表一：劉本與邵本《呂祖全書》所收的道經比對

	經典	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	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
1	《呂祖本傳》	卷一	第一冊 角，卷一
2	《靈應事蹟》	卷二	第二冊 亢，卷二
3	《文集》(上、中、下) <sup>151</sup>	卷三	第十六冊 婁，卷三十四
		卷四	第十六冊 婁，卷三十五
		卷五	第十七冊 胃，卷三十六
4	《指玄篇》	卷六	第十九冊 畢，卷四十一
5	《忠誥》並論序	卷七	第三冊 氏，卷三
6	《孝誥》並論序跋	卷八	第三冊 氏，卷四
7	《前八品仙經》(上並序圖、下)	卷九	第四冊 房，卷五
		卷十	第四冊 房，卷六
8	《後八品仙經》并序	卷十一	第五冊 心，卷七
9	《五品仙經》并序	卷十二	第五冊 心，卷八
10	《清微三品經》(上并序、中、下)	卷十三	第六冊 尾，卷九
		卷十四	第六冊 尾，卷十
		卷十五	第六冊 尾，卷十一
11	《參同經》(上并序、中、下)	卷十六	第七冊 箕，卷十二
		卷十七	第七冊 箕，卷十三
		卷十八	第七冊 箕，卷十四
12	《聖德諸品經》 <sup>152</sup>	卷十九	第八冊 斗，卷十五
13	《金丹直指諸品經》 <sup>153</sup> 附《坤元經》	卷二十	第八冊 斗，卷十六

<sup>151</sup> 邵本卷下增：補遺序賦篇歌古風詩詞偈，原集無，乙未增入。

<sup>152</sup> 邵本題為：「聖德諸品經上」。

<sup>153</sup> 邵本題為：「聖德諸品經下附坤元經道德經并說三篇」；《道德經》附原集無，甲午重校贈入。

14	《醒心經》并序	卷二十一	第八冊 斗，卷十七
15	《度厄救劫救苦滌氛四神咒》	卷二十二	第二十四冊 柳，卷五十三
16	《雪過修真懺》	卷二十三	第二十五冊 星，卷五十四
17	《玉樞經讚》附或問	卷二十四	第十三冊 室，卷二十八
18	《葫頭集》(上、下)	卷二十五	第十七冊 胃，卷三十七
		卷二十六	第十七冊 胃，卷三十八
19	《涵三雜詠》	卷二十七	第十八冊 昴，卷三十九
20	《涵三語錄》	卷二十八	第十八冊 昴，卷四十
21	《修真傳道集》(上、下)	卷二十九	第十五冊 奎，卷三十二
		卷三十	第十五冊 奎，卷三十三
22	《敲爻歌沁園春註解》 <sup>154</sup>	卷三十一	第二十五冊 星，卷五十五
23	《呂祖誥》 <sup>155</sup> 附柳王二真君及葛天君誥	卷三十二	第二十八冊 軫，卷六十四
24	《靈寶畢法》 <sup>156</sup>	續編	第十四冊 壁，卷二十九—三十一
25	《禪宗正指》 <sup>157</sup>	外附	第二十八冊 軫，卷六十一—六十三

<sup>154</sup> 邵本增：王都中題〈沁園春詩〉。

<sup>155</sup> 邵本增：東華、西池、五祖、南五祖、北七真、八仙及張紫陽、邱長春、白紫清等誥十六章。

<sup>156</sup> 邵本〈凡例〉稱：劉本因其晚出，續於卷末。

<sup>157</sup> 邵本〈凡例〉稱：劉本以佛典附刻卷外。

附表二：邵志琳六十四卷《呂祖全書》增補道經目錄

	經典	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
1	《神化妙通紀》	附於卷二《靈應事蹟》
2	《呂祖道德經》附	附於卷十六《聖德諸品經》下
3	〈廣慧超劫經序〉	第九冊 牛，卷十八
4	〈延生證聖經跋〉	第九冊 牛，卷十九
5	《先天一炁度人妙經》	第九冊 牛，卷二十
6	〈心經序〉	第九冊 牛，卷二十一
7	〈金丹示掌初編序圖後記〉	第十冊 女，卷二十二
8	《三寶心鑑》(上、下)	第十冊 女，卷二十三； 第十一冊 虛，卷二十四
9	〈訓世文序〉附〈求子文人道論幕窗悔過記〉	第十一冊 虛，卷二十五
10	《金剛經註釋》(上、下)	第十二冊 危，卷二十六； 第十三冊 室，卷二十七
11	〈渾成集序〉	第十九冊 畢，卷四十二
12	《名壇新涼》	第二十冊 觜，卷四十三
13	《語錄會粹》	第二十一冊 參，卷四十四
14	〈福報指南序〉附〈正教編〉	第二十二冊 井，卷四十五
15	〈儒道同源序圖〉	第二十二冊 井，卷四十六
16	〈群言會粹序〉	第二十二冊 井，卷四十七
17	《藥石製》	第二十三冊 鬼，卷四十八
18	〈金華宗旨序跋〉附邱譚二真人垂示二則	第二十三冊 鬼，卷四十九
19	〈金丹種子編後跋〉附證案二十則	第二十三冊 鬼，卷五十
20	《警世功過格論求心編》附〈元魁秘訣〉	第二十四冊 柳，卷五十一
21	《十戒十行垂訓》附《劉註》	第二十四冊 柳，卷五十二
22	〈百字碑註解序〉	第二十五冊 星，卷五十五
23	〈廣化真經序跋〉附〈閩中顯化事蹟〉	第二十六冊 張，卷五十六
24	〈治病仙方決疑籤詩戒醫士言泰山符〉	第二十六冊 張，卷五十七

25	《金丹救劫度人寶懺》附〈雲崖自述〉	第二十七冊 翼，卷五十八
26	《慈航無極寶懺》序跋	第二十七冊 翼，卷五十九
27	《證道成真心懺》	第二十七冊 翼，卷六十

附表三：三十二卷《呂祖全書》與《呂祖全書宗正》比較

	經典	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	《全書宗正》
1	《呂祖本傳》	卷一	第一冊，卷一
2	《靈應事蹟》	卷二	第一冊，卷二
3	《文集》(上、中、下)	卷三	第八冊，卷十二
		卷四	
		卷五	
4	《指玄篇》	卷六	
5	《忠誥》並論序	卷七	第二冊，卷三
6	《孝誥》並論序跋	卷八	第二冊，卷三
7	《前八品仙經》(上並序圖、下) <sup>158</sup>	卷九	第二冊，卷四
		卷十	
8	《後八品仙經》并序	卷十一	
9	《五品仙經》并序	卷十二	第二冊，卷五
10	《清微三品經》(上并序、中、下) <sup>159</sup>	卷十三	第三冊，卷六
		卷十四	
		卷十五	
11	《叅同經》(上并序、中、下) <sup>160</sup>	卷十六	第四冊，卷七
		卷十七	
		卷十八	
12	《聖德諸品經》	卷十九	
13	《金丹直指諸品經》附《坤元經》	卷二十	
14	《醒心經》并序	卷二十一	第九冊，卷十四
15	《度厄救劫救苦滌氛四神咒》	卷二十二	

<sup>158</sup> 《全書宗正》題為：「八品仙經」。

<sup>159</sup> 《全書宗正》題為：「三品仙經」。

<sup>160</sup> 《全書宗正》題為：「同叅經」。

16	《雪過修真懺》	卷二十三	
17	〈玉樞經讚〉附或問	卷二十四	
18	《葫頭集》(上、下)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19	《涵三雜詠》	卷二十七	
20	《涵三語錄》	卷二十八	第五冊，卷八
21	《修真傳道集》(上、下)	卷二十九	第六冊，卷九
		卷三十	
22	《敲爻歌沁園春註解》 <sup>161</sup>	卷三十一	第九冊，卷十七
23	《呂祖誥》附柳王二真君及葛天君誥	卷三十二	第一冊，卷一
24	《靈寶畢法》	續編	
25	《禪宗正指》	外附	

<sup>161</sup> 《全書宗正》只題：「沁園春註」。

附表四：《全書正宗》與《全書宗正》所收道經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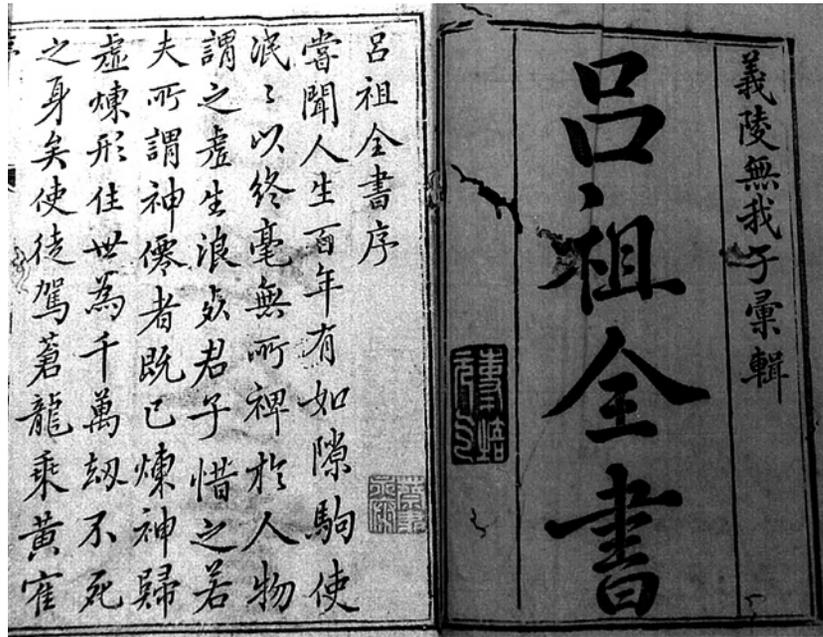
	經典	《全書正宗》	《全書宗正》
1	聖像	第一函、卷首	
2	寶誥	第一函、卷首	第一冊，卷一
3	寶懺（《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	第一函、卷首	
4	本傳	第一函、卷首	第一冊，卷一
5	祠記	第一函、卷首	
6	《十六品經》	第一函、卷一	第二冊，卷四（題為：「八品仙經」）
			第二冊，卷五（題為：「五品仙經」）
			第三冊，卷六（題為：「三品仙經」）
7	《天仙金華宗旨》 <sup>162</sup>	第一函、卷二	第七冊，卷十
8	《同叅經》	第一函、卷三	第四冊，卷七
9	五經合編：《呂帝心經》、《先天一度人妙經》、《延生證聖真經》、《金玉寶經》、《醒心真經》 <sup>163</sup>	第一函、卷四	第九冊，卷十四（《醒心經》）
10	《呂帝文集》	第二函、卷五	第八冊，卷十二
11	《呂帝詩集》	第二函、卷六	第八冊，卷十三
12	《金剛經註》	第二函、卷七	
13	《道德經解》	第二函、卷八	
14	《斗／雷經疏解》	第三函、卷九	
15	《呂子易說》	第三函、卷十	
16	《傳道集》	第三函、卷十一	第六冊，卷九

<sup>162</sup> 《全書宗正》卷十一另有「《金華闡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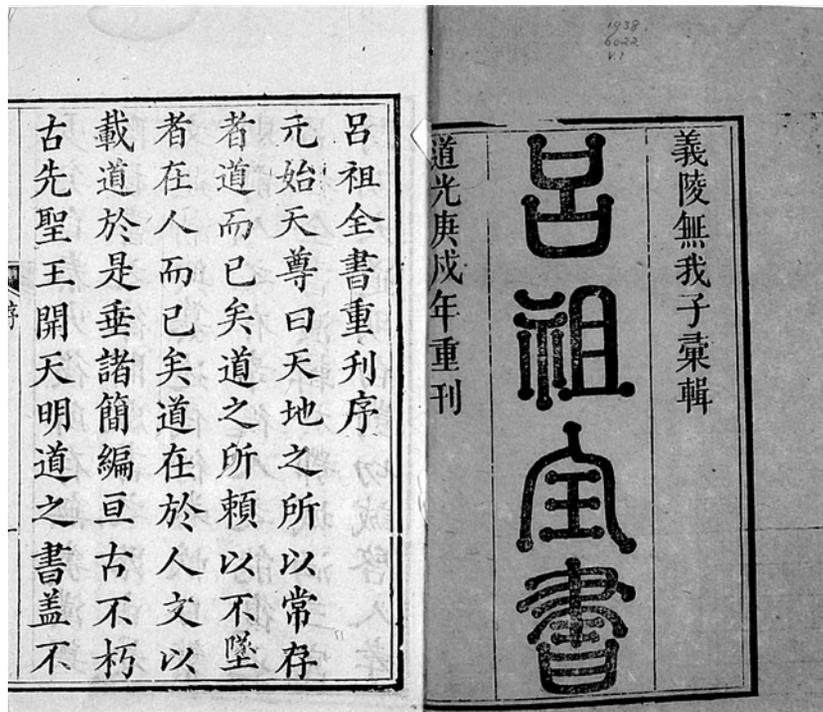
<sup>163</sup> 《全書宗正》只存其中兩部經。

17	《天仙金丹心法》	第三函、卷十二	
18	《玄宗正旨》	第四函、卷十三	
	《禪宗正指》		
19	《十戒功過格》	第四函、卷十四	
20	《聖蹟紀要》	第四函、卷十五	第一冊，卷二
21	語錄大觀：《涵三語錄》、《雲巢語錄》、《趵突語錄》、《玉詮語錄》、《新月語錄》、《玉清語錄》	第四函、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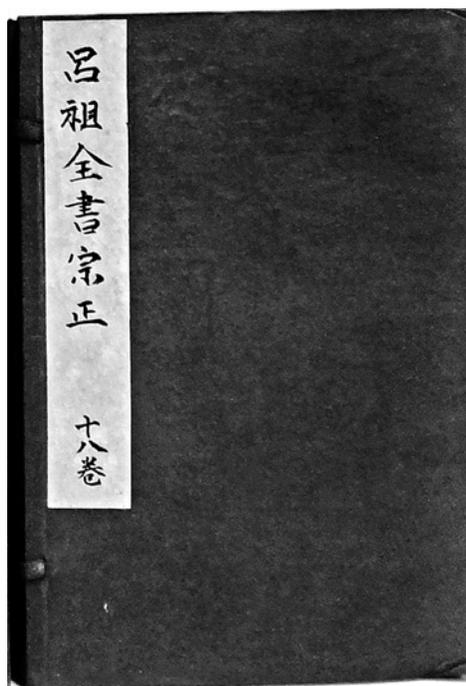




圖一：乾隆九年《呂祖全書》(日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圖二：道光三十年《呂祖全書》(香港中文大學藏)



圖三：《呂祖全書宗正》(日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圖四：《呂祖全書正宗》(日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全書正宗後序  
蔣太僕予蒲示予彙刻  
呂祖全書十六卷。且請識數言  
于後。竊惟此書採選極博。然大  
都出於飛鸞行化之所闡。攄夫  
寓一神于兩手。而神者妙而為

圖五：蔣子蒲〈全書正宗後序〉

修補全書記  
全書宋正長洲彭氏舊本也。乾隆十二年吾鄉  
藝圃周太史祖父沙山大府君承  
陳觀察于山長囑刻以刪改未定不及鏤板。遲數十  
年後得汪丈柳亭、邱丈通霄、余丈顧林、先府  
君聽濤公始悉力捐贖刊刻行世。板存汪氏小築。余五  
十年前往來小築屢親見之。嘉慶癸酉後社友老翁  
後歸道山。壯者又公私交迫無暇愛護。此板不知于落  
今尋求多年。於道光十年知維時西長街二帝廟高君

圖六：陳謀〈修補全書記〉

## 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 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

黎志添

自從第一部《呂祖全書》於清代乾隆九年(1744)問世以後，乾隆、嘉慶兩朝的數十年間，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由各個呂祖扶乩道壇的弟子編纂和刊刻的四種《呂祖全書》。這四種《呂祖全書》包括：(1)由劉體恕、黃誠恕等彙輯，乾隆九年刊刻完工的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2)由蔡來鶴及其弟子邵志琳(1748-1810)在乾隆四十年(1775)採集增添後完成的新編六十四卷《呂祖全書》；(3)所謂考訂本的《呂祖全書》，稱為《呂祖全書宗正》，共有十八卷；(4)由覺源壇弟子重訂和刊刻的十六卷本《呂祖全書》，稱為《呂祖全書正宗》。

本論文以乾隆九年劉體恕本為研究出發點，視之為清代《呂祖全書》的研究底本；一方面追溯在三十二卷本中所收錄的二十多部呂祖道書的源流、出處、形成及其與相關扶乩道壇的關係；另一方面，以劉本作為底本，進一步比較其餘三種《呂祖全書》，分析它們之間所採集和增補的呂祖道書的異同，整理出四種《呂祖全書》各自的編纂特色、採集內容和刊行目的，以使我們能夠掌握清代呂祖乩壇弟子如何以刊刻《呂祖全書》為手段，推動傳播清代呂祖心性修煉和三教歸一的信仰思想之歷史發展和宗教意義。

本文結論是，以《呂祖全書》為代表的呂祖扶乩信仰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裏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在各地的呂祖乩壇中，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分子以非常投入的信仰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

關鍵詞：《呂祖全書》 呂祖扶乩 《呂祖全書宗正》 《呂祖全書正宗》

涵三宮 覺源壇

## The Four Compilations of *Lüzū quanshu* and Daoist Spirit-Writing Altars in the Qing Period

LAI Chi Tim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Lüzū quanshu* (Complete Writings of Ancestor Lü [Dongbin]) took place in the 9<sup>th</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1744). It was followed by four editions compiled by Daoist spirit-writing altars in Wuchang in Hubei, Hangzhou in Zhejiang, Suzhou in Jiangsu, and in Beijing. The four editions are: 1. The 32-*juan* *Lüzū quanshu* compiled by Liu Tishu and Huang Chengshu in the 9<sup>th</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2. The expanded 64-*juan* *Lüzū quanshu* compiled by Cai Laihe and his disciple Shao Chili in the 40<sup>th</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1775); 3. An 18-*juan* version referred to as *Lüzū quanshu zongzheng* compiled by followers of the Lüzu cult in Suzhou around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4. A 16-*juan* version referred to as *Lüzū quanshu zhengzong* compiled by Jiang Yupu and his disciples at Jiaoyuan Tang, Beijing, in the 8<sup>th</sup> year of the reign of Jiaqing (1803).

Based on Liu Tishu's edition of *Lüzū quanshu*, this paper correlat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form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enty-some books of Lüzu in Liu's edition and the spirit-writing alta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will also compare it with the other three editions to analyze the operative principles of redaction, their features, contents and objectives.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Lüzū quanshu*, but will also reveal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s of how the compilation itself was used as a means to promote heart-and-mind cultivation, and the three-religions-in-one (*sanjiao gui'yi*) as advocated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Lüzu cult.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t was the conscientious effort of the Confucian-Daoist literati of the various Lüzu spirit-writing altars in China, instead of the Quanzhen Longmen priests, that made possible the compilation, print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Lüzū quanshu*.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scriptural transmission is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one that makes the cult of Lüzu spirit-writing a unique Daoist tradition significant to the study of Qing Daoism.

**Keywords:** *Lüzū quanshu* Lüzu spirit-writing *Lüzū quanshu zongzheng*  
*Lüzū quanshu zhengzong* Hansan Gong (Triple-Encompassing Palace)  
Jueyuan Tang (Altar Awakened to the Origin)

## 徵引書目

- 《九重闕關敕演棲真大典拔濟苦海洞妙佐微仙經》，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1期，頁16-21。
- 王宗耀編著：《湖州金蓋山古梅花觀志》，湖州：古梅花觀內部資料，2003年。
- 《玉詮語錄》，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八年(1803)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吳亞魁：〈金蓋山人閱一得傳略〉，《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3期，頁139-148。
- \_\_\_\_\_：《江南全真道教》，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 李家駿：《〈呂祖全書〉研究：從劉體恕《呂祖全書》的編集和影響探討清代呂祖道壇的信仰特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論文，2012年。
-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127-191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呂岳(巖)，楊良弼校刊：《純陽呂真人文集》，收入《道書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
- 呂巖：《純陽呂真人文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孚佑帝君註解，培真道人校正：《般若心經註解》，收入《續藏經》第42冊，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1967年。
- \_\_\_\_\_：《金剛經注解》，收入《續藏經》第40冊，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1967年。
- 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收入龔鵬程、陳廖安編：《中華續道藏·初輯》第2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
- 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收入《道藏》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 《金蓋心燈》，收入《藏外道書》第31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年。
- 高萬桑(Goossaert, Vincent)著，吳亞魁譯：〈金蓋山網絡——近現代江南的全真居士組織〉，收入趙衛東主編：《全真道研究》第一輯，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
- 莫尼卡：〈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清代全真認同〉，收入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齋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 \_\_\_\_\_：〈清代全真教之重構：閱一得及其建立龍門正統的意願〉，發表於香港青松觀主辦：「探古鑒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青松觀，2010年1月6-8日。
- \_\_\_\_\_著，萬鈞譯：〈「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頁17-27。
- 《涵三語錄》，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陳雲：《閱一得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 陳謀補刻：《呂祖全書宗正》，清咸豐二年(1852)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清微三品經》，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叅同經》，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彭文勤纂輯，賀龍驤校勘：《重刊道藏輯要》，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重刊本，成都：四川大學圖書館藏。
- 彭紹升：《一行居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年。
- 森由利亞：〈清代全真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收入《天台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 \_\_\_\_\_著，孫穎、葛強譯：〈呂洞賓與全真教——以清朝湖州金蓋山的事例為中心〉，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上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棲真宣演拔濟苦海雪過修真仙懺》，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焦大偉(Jordan, David)、歐大年(Overmyer, Daniel)合著，周育民譯：《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靖道謨等纂，張廣泗等修：乾隆《貴州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第8，據清乾隆六年(1741)刊本縮版影印，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
- 溥仁乩釋，子真乩訂：《金剛經註釋》，收入《續藏經》第40冊，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1967年。
- 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3)刊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乾隆九年(1744)刊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_\_\_\_\_：《呂祖全書》，道光二年(1822)刊本，北京：中國道教協會藏。
- \_\_\_\_\_：《呂祖全書》，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龍門正宗覺雲本支道統薪傳》，收入《藏外道書》第31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年。
- 釋慧鐸：〈清初蘇州玉壇的降鸞應化——以《玉詮》為中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11期，2008年12月，頁90-124。
- 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
- 森由利亞：〈『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に見る全真教の特徴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9號，1992年，頁31-47。
- \_\_\_\_\_：〈『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註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5號，1998年，頁43-64。
- \_\_\_\_\_：〈『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98號，2001年，頁33-52。

- \_\_\_\_\_ : 〈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と全真教——『清微宏範道門功課』の成立をめぐって——〉, 收入堀池信夫、砂山稔編:《道教研究の最先端——第一九回國際宗教學宗教史會議世界大會道教パネル論集》, 東京:大河書房, 2006年。
- Esposito, Monica.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43 (1998): 90-110.
- Yuria, Mori.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u in Qing China.” In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Edited by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165-184.